

# 抒情與本土

## ——「世界中」的台灣文學及其時空關係

鍾秋維

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 摘要

在台灣民族主義者的文學論述，亦即台灣文學本土論中，如何權衡「自我—本土」與「他者—世界」的互動一直是重要的問題。而在現有的構圖中，「中國」對論者來說無疑是個棘手的變因——它一方面被定義為世界（範疇可能是東亞、華語語系、乃至全球）的一部分，而理應平常心對待；但另一方面卻又是本土論者欲藉通往世界來稀釋影響（或威脅）的單一他者。在這個意義上，比如「抒情傳統」這類仍明顯在台灣現代文學史中賡續的「中國」因素，遂也只能淪為聊備一格的尷尬成分。與此同時，由於目前的本土論根本上是站在福佬人·異性戀的立足點，它勢必也將排擠其他差異的族群與性別經驗。那麼夾帶抒情傳統的邊緣族群不免更加可有可無。本文首先分析幾種相合於本土論格局的連結台灣與世界之重要論述，尤其著眼於其中涉及晚近復興的「世界文學」認識論者，而嘗試指出在這之中暗含的「西方vs.其他世界」階序；更進一步，本文援用海德格式的存有觀念與「世界中」的提法，試圖在本土論習慣的民族主義·身分政治思考「之外」，另闢思考台灣處境的方式。總而言之，本文認為，過往建構台灣身分、以至於比較台灣的方法，有過於執著特定「空間」之內的傾向，相對於此，重提「時間」的重要性，並且恢復「世界中」的「台灣文學」及其「時空關係」，將有助於本土論朝向民族主義「之外」，乃至「之前」展開的可能。

關鍵詞：台灣文學本土論、世界文學、世界中、抒情傳統、時空關係

# The “Lyrical” and the “Local:”

## “Worlding”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its Spatiotemporal Relations

**Chung Chih-Wei**

Ph. 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Taiwanese nationalist literary discourse, also referred to as “Taiwanese Literary Localism,” is deeply concerned with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elf” (or the “local”) and “others” (or the “world”). However, within its existing analytical framework, “China” is no doubt a problematic variable. On the one hand, “China” is defined as a part of the “world”— be it part of East Asia, the Sinophone or 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should thus be considered an equal entity alongside the other nations of the globe.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holds a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thus, localists cannot help but seek to dilute its impact by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n this sense, discourses which focus on the lineage between Chinese and Taiwanese literature, for instance the “Lyrical Tradi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re seen as an embarrassment from the outset. Moreover, the current localist narrative is often oriented arou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Hoklo people and the heterosexual; as a result, the experiences of different ethnic and sexual minorities are inevitably marginalized. All in all, writers who adhere to the lyrical tradition and also come from a marginalized group would be considered even more insignificant in the eyes of those from the localist camp.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some quintessential localist models that connect Taiwan and the world - in particular, those who call for the revival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framework – in order to reveal the implied hierarchy of “the ‘West’ vs the ‘Rest’” in their discourse. Furthermore, by heading beyond the identity politics embraced by the localists,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the Heideggerian concepts of “being” and “worlding” can provide a new way by which to rethink Taiwanese situated-ness. Ultimatel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given methodology adopted by the localists to construct the “Taiwanese” identity and place “Taiwan” in a comparative framework is problematic, as it tends to overemphasize “space / spatiality” and overlook “time / temporality.” One solution would be to manifest the significance of “time” via “worlding”. This would not only better situate Taiwan in a spatiotemporal configuration, but also aid the localist in transcending nationalist doctrine.

Keywords: Taiwanese Literature Localism, World Literature, Worlding, Lyrical Tradition, Spatiotemporal Relations



# 抒情與本土

## ——「世界中」的台灣文學及其時空關係

### 一、出「花園」記：“representation”之外

「這些鳥兒，」郭老感慨道，「不動情則已，一動起情來，就要大禍降臨！」（《孽子》，頁82。）<sup>1</sup>

「去吧，阿青，你也要開始飛了。這次你們血裡頭帶來的，你們這群在這個島上生長的野娃娃，你們的血裡頭就帶著這股野勁兒，就好像這個島上的颱風地震一般。你們是一群失去了窩巢的青春鳥。如同一群越洋過海的海燕，只有拚命往前飛，最後飛到哪裡，你們自己也不知道——」（《孽子》，頁88）

經過這樣的路程，兩個長久相知的人，曾經相愛相分離又重聚首的兩個人，陪著一輛很破舊的腳踏車，在如此人生的切點，如此花開的季節，是在做著一種什麼樣的冒險與追尋呢？兩個遠離家園故土、遠離親舊所愛，又各自去了不同的陌生國度的人，重逢在一條陌生又陌生的公路上，共踩著疲憊的腳踏車，而其中一人正瀕臨著死亡的命運，我們是在做著一種什麼樣的放逐、流浪與回歸呢？（《蒙馬特遺書》，頁153。）<sup>2</sup>

白先勇（1937-）的《孽子》講述青少年男同志李青被父親趕出家門後流

- 
- 1 白先勇，《孽子》（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9.03）。後文引述本書頗多，以下直接在引用處標記頁碼、章節。
  - 2 邱妙津，《蒙馬特遺書》（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公司，2006.10）。後文引述本書頗多，以下直接於文中引用處標記頁碼。。

連在台北街頭的情慾冒險與身分（identity）探索，<sup>3</sup>而邱妙津（1969-1995）的《蒙馬特遺書》同樣是一則追求愛與生命究極意義的故事，只是主角變成了青年的女同志。連載於政治與文化朝本土改革的七〇年代末至八〇年代初，而在1983年出版的《孽子》，它主要的歷史時空是七〇年代中後期的台北，這一幫「青春鳥」的故事結束於庇護阿青等人的傅老爺子（一個「父親·中國」的形象）去世，<sup>4</sup>一群人等只好「飛鳥各投林」，繼續在台北城四處流散、另謀出路，而阿青的「兄弟」小玉甚至終於成功「跳船」，流入益發堂皇的大都會東京。而彷彿接續著《孽子》的命題，進入大學時正逢解嚴的《蒙馬特遺書》的主述者「我」與摯友小詠，畢業後為探求愛以及知識的真諦，分別流浪到異鄉大都會的巴黎與東京，不過多年後在櫻花盛開時節重逢的兩人，青春的躊躇滿志不復可見，所剩的唯有盤旋在愛的廢墟上的死亡預感。時至今日，白先勇和邱妙津，《孽子》與《蒙馬特遺書》，早已都是台灣文學傳奇的作家、經典的作品，這不僅只因為其人其作可視為台灣“representation”的政治——為性少數「代言」，而「再現」了男女同志認同的鬥爭——之典型例子，<sup>5</sup>或許更出於故事中座落於外的邊緣的主體位置愈加有效地曝現了「台灣」作為一種存有形式其之界限，而具有彰顯某種（至少對於此間來說）共通世界觀的可能性。

對於這種處於外的主體位置，一個直覺式的解法大概是透過上述本土化歷程的演進來看待這種共通性。識者已經指出，《孽子》的結局暗示著某種不同於《台北人》般執著大陸過去的認同台灣的趨向，<sup>6</sup>以及伴隨這個趨向而來的罕見正面結尾。<sup>7</sup>不過在白先勇的小說裡，和母親類似都因「害怕面對父親那張悲痛灰敗的臉」（頁206）而不得不「在驚懼、在竄逃、在流浪」（頁205）中流離失所的阿青，同時也對於實質的、乃至象徵的「父親」有著無法割捨的情意結；換言之，小說敘述者「我」＝阿青畢竟仍糾結於中國或台灣身

3 本文依據文脈將“identity”譯為「身分」或者「認同」。

4 柯慶明，〈《孽子》的「台北人」傳奇〉，《台灣現代文學的視野》（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6.12），頁245-248。

5 本文依據文脈將“representation”譯為較具政治意涵的「代言」，傾向美學表意的「再現」，或者兼而有之的「代現」。

6 梅家玲，〈白先勇小說的少年論述與台北想像：從《台北人》到《孽子》〉，《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2.11），頁203-236。

7 柯慶明，〈情慾與流離：論白先勇小說的戲劇張力〉，《台灣現代文學的視野》，頁299。

分的難題。與此同時，若從本土派的觀點來看《蒙馬特遺書》，很快會遇到一個瓶頸，亦即邱妙津大半都在描述私我的情感故事、紀錄哲思筆記的作品，不同於白先勇，一來欠缺對於外界公共事件的實質指涉；再者，即便對其文本作某種「國族寓言」或「徵狀閱讀」的解釋，得到的很可能是與本土派後殖民議程不同的展望。這一現象是頗為微妙的，從世代與族群來看，本省籍、且屬學運世代的邱妙津理論上應該比白先勇貼近本土。男性和女性所扮演的不同社會角色在同志身分中的延續可能提供給這個逆反一個解釋，而這份連帶也提示了，儘管同屬於性的弱勢（minority）地位，介於男同志與女同志之間更多的可能是差異的事實。<sup>8</sup>另一方面，作為邊緣的同志族群其之存在經驗畢竟與主流異性戀的建制（包括家庭、學校與民族國家等）不完全一致，酷兒的時間性（queer temporality）總是與之處於對話的斡旋或對峙的緊張。<sup>9</sup>在這個意義上，被突顯的依然是差異的不共性。

易言之，必須另闢蹊徑才能較為適切地鉤沉潛伏在兩者的連結之下的那個共通的台灣世界觀。轉而去觀察小說中的比喻（trope）可能是一種方式。以《孽子》而言，至少有兩個核心的比喻系統，首先是如前引文所示的「颱風地震」這一組；再者是第二則引文所指向的、阿青即將飛往的「新公園」。第一、二段引文均來自相館「青春藝苑」的主人郭老的談話，郭老一直以來扮演引介新人踏入男同志集會的秘密地點新公園的迎接者角色，他告訴他們新公園的傳說，同時替他口中這些「青春鳥」攝像、為之命名（使其人意象化），然後編列成相冊《青春鳥集》。不少證據都指出這一人物與情節設定可能挪用了集中國抒情文學之大成的《紅樓夢》其中太虛幻境的警幻仙子，以及題為「金陵十二金釵」的人物冊本——大觀園及賈府諸芳正是其在人間的投影——白先勇更進一步將這個神界仙境酷兒化為新公園與一群倚賴賣淫維生的底層男同志。不過這些在歡笑場打滾的男同志一旦動了真感情，由於現實的不允許，往

8 在中文的語境中，「女同性戀」作為一種身分屬性如何與父權、強迫異性戀以至於民族國家進行抗爭可見桑梓蘭著，王晴鋒譯，《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11）。

9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01），頁68-70。不同於紀大偉原文將這個詞翻譯成「酷兒的種種時間表」，本文仍選擇「酷兒的時間性」的譯法，相關說明詳後。

往非死即瘋。而這個設計顯然是對於中國抒情文學的另一經典《牡丹亭》中，杜麗娘為情而死的這一情節之戲仿（parody）、或者致敬。

從「花園」走向「公園」，從大家閨秀經歷「被甩到世界」（thrownness）而為賣淫男娼，白先勇為中國文學抒情傳統打開的另類身心慾望與酷異視域在在引人側目。<sup>10</sup>而在《孽子》中，白借用島上的「地震颱風」來合法化他對瑰麗的抒情經典施加的劇烈轉化。無論視這個比喻暗示著反離散的落地生根、或者身為「在這個島上生長的野娃娃」不可逆的宿命，青春鳥所在的畢竟都是「台灣」特殊的處境。更進一步來說，「新公園」究其實質比喻的乃是台北、甚至台灣，在這裡出入的行為者（agent）輻輳出島上各種男女性別，異同性向，原漢、省內外族群與差異階級的多元身分屬性，也同時接駁外縣市移民（如從三重逃出來的小玉他的母系來自桃園）、高階與底層外省人移民（將軍族的王夔龍南京東路的舊宅、低階軍人後代的阿青龍江街的老家等等）匯集台北，而且揭示在「土著」的「台灣」人外，這座島嶼的身世還牽連著地緣政治中的日本乃至美國的（舊／新）帝國主義擴張——小玉據信是父不詳的台「日」混血，而收容小玉與阿青、在酒吧工作的麗月育有一個和非裔美國人所生的小孩。<sup>11</sup>在這個意義上，斷言「新公園」是一個彰顯「台灣（人）」生而混雜的存有本質之比喻並不為過——這座公園中介的慾海情天轉折出島上世間百態，一群為主流放逐在外的男同志反而曝現了後殖民「台灣」不道地、本不真（inauthentic）的存在焦慮。

而另一方面，在《孽子》擊劃的新公園裡，中國文學抒情傳統裡的才子佳人走入的不只是個凡俗的大千世界，那更是一個充滿現代性驚嚇（shock）、無機質人流與透明可視的窗框、慾望伊於胡底的台北城、台灣島。<sup>12</sup>若然似乎可以說，白先勇是一個在抒情傳統已經失去其古典中國花園的時代裡的抒情作

10 「被甩到世界」（thrownness）這個詞當然來自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見*Being and Time*. Trans. Joan Stambaugh (Albany: SUNY Press, 1996). 詳後。

11 相關情節可見第二部頁4、12。

12 高友工在討論《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傳統敘述文學的論文裡指出，這兩部作品的出現標誌了以詩為尊的抒情美典對現實開啟，而這一開啟勢必連帶著文類與世界觀的衝突與協商，見高友工，〈中國敘述傳統中的抒情境界：《紅樓夢》與《儒林外史》讀法〉，《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08），頁353-370。而白先勇的《孽子》顯然更加劇了抒情境界與現實之間的緊張關係。

家——一如在抒情詩流失它的讀者時依然寫作這一文類的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sup>13</sup>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曾以巴黎的拱廊街、中央公園、咖啡館與街壘（barricade）等空間的形式來對比、論證波特萊爾對處於「現代」時間的存在感知之捕捉。<sup>14</sup> 而就在這裡，《孽子》和《蒙馬特遺書》的接點浮現出來。

《蒙馬特遺書》紀錄「我」訴諸愛與慾望、藝術和生命（也即存在）的沉思與實踐，故事的主要場景就座落在「我」刻正留學——或者用「我」自己的話說「放逐、流浪」中——的現代性之都巴黎。《蒙馬特遺書》的卷頭語導引的：「若此書有機會出版，讀到此書的人可由任何一處讀起。它們之間沒有必然的連貫性，除了寫作時間的連貫之外。」邱妙津顯然很有意識地在違逆因果律的、線性的時間表，而這一意圖在形式上體現為這部作品基本上是由片段的（fragmental）書信、日記和筆記等自白式的（confessional）抒情風格串連敷衍，進而展現為情節中人與人聚散的無常、事件和事件零星的交集；這些雪泥鴻爪般的碎片之能夠產生關連而合為一作，乃是因為「我」的抒情發聲（lyrical enunciation）才得以闡連（articulate）在一處：「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必然的關連性嗎？或者說，天涯海角存在著一個人和我有必然的關連性而我要去尋找？八年了，我總是問自己這個問題。」（頁154）易言之，它是一部在「偶然性」和「必然性」間掙扎、求索的慾望與哲思之書。貫串這一求索過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各種「跨國性」的軌跡——它一方面是行為者實質地在台灣、日本、法國之間穿梭移動，而更顯示在《蒙馬特遺書》與世界（特別是高層）文學、藝術與哲學之間的互文性，包括了「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第十八書〉正文僅僅只有一行，而那正是對於《詩經·邶風·擊鼓》：「死生契闊，與子誠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一詩的引述。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蒙馬特遺書》是將《孽子》展演台灣存有之（不）道地性的現代「出花園記」，從一個更處於外、更全球化，某種程度亦更「後

13 Walter Benjamin, *The Writer of Modern Life: Essays on Charles Baudela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70.

14 同註13, "Central Park" and "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

現代」的語境裡加以敷衍。而這一點的被發現同時也提示了，這部邱妙津以「一生來證明自己的美與愛」終於「綻放出愛與美的憂傷繁花，永恆回歸了藝術家與愛人者身分」的純粹作品，<sup>15</sup>它背後的語境其實是解嚴後的台灣以及後冷戰的全球；亦即「我」之能夠「自由」在東西之間來去，自我完成身為藝術家的「主體性」追求，這些能動性（agency）都鑲嵌在「台灣」獨一的（singular）後殖民混雜結構之中。如此一來，邱妙津的躁動不妨也可被視為後殖民台灣（人）存在危機的一種暗示，而《蒙馬特遺書》的抒情表述未嘗不能在一旁顯現（showing alongside）解嚴後台灣的世界圖像。<sup>16</sup>

換言之，在表面上南轅北轍互不相同的《孽子》和《蒙馬特遺書》之間，確實存在一種共通的世界觀，它揭示台灣人特定的後殖民混雜存有狀態，而且都同樣體現在某種抒情的母題（motif）之中。不過這一共通性在目前台灣本土派的文學論述中，由於它更願意強調的是台灣人弱裔主體性的差異與特殊（particularity），遂沒有得到足夠的注意；另一方面，由於奠定這套世界觀的存在經驗它藉以表達的抒情母題時常指涉「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詩經》、《牡丹亭》與《紅樓夢》等等），這個傾向使其更易於被本土派冷處理。<sup>17</sup>比起處在外邊而彰顯台灣混雜的（不）道地存有，本土派大都致力於透過「空間」（一套給定的符號律則）之視角來代現純正的「台灣」身分，並借以和其最巨大的他者「中國」進行認同形構（identification）的鬥爭。而這類觀點雖然也認可跨國所形構的混雜文化，但站在本土的立場，這個混雜文化必須附屬於「台灣」這個意符所代現的正當身分之下，而不能是個別的台灣存有它自身「如其所是」（being-such; being-such-as-it-is）的經驗之彰顯，<sup>18</sup>也即「時間」，綿延的軌跡。本文寫作的目標即檢討當前「台灣文學本土論」獨

15 這是印刻版《蒙馬特遺書》封底的文字。

16 「在一旁顯現」走的不是身分政治「普遍vs.特殊」的再現法則，而是一種處於外的「曝現」（expose），見陳春燕，〈文學（中）的身分：讀邱妙津日記〉，《中外文學》40卷3期（2011.09），頁97-138。

17 台灣文學，尤其是現代主義者，與抒情傳統的連結其實非常深厚，這條文學史脈絡至今仍少有人正視、遑論梳理，不過柯慶明，〈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中國文學的美感》（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5.12），頁389-460，一文已為它鋪陳了大致的輪廓。而本文之所以特出白先勇與邱妙津，意在藉由其人酷異化的實踐，更強調出難與主流本土論合流的——用後殖民的行話來說——多重邊緣（陞）性。

18 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trans.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p.1-2.

尊空間的學術取徑其之脈絡及得失，並希望將「時間」重新帶入吾人界定「本土」、想像「台灣」時候的視野。

而須再略做說明的是，何以本文在設想如何從「時間」的角度反思、乃至於重構台灣文學所體現的此間存有的處境性時，會特別著重在處理本地或本土文學者所內建的「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之所以將「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特別標誌出來，一方面是基於「抒情」(the lyrical)的理論所具有的「非模擬」(non-mimetic)、抗拒代現機制的意涵，這一批判的走勢對高舉社會寫實之代言功能的必要性，同時執著於其再現有效性之衡量的本土論而言，毋寧深具啟發。另一方面，本文不只談抒情，還為其加上「中國文學」與「傳統」的前、後綴，則在於強調——一來，不論是台灣文學，或者是它所展演的抒情風格(lyricism)，都不是橫空出世、無中生有，恰恰相反，就如前面所舉的白先勇與邱妙津之例所顯示的，它可能與中國文學一個主要的示意(signification)系統，也就是抒情傳統，深有淵源。

換言之，台灣文學的抒情風格，從文學史的——亦即時間的——角度來看，毋寧是某個特定「傳統」的衍生。<sup>19</sup>但是現在的問題是，由於本土論成立的特定脈絡使然，它對作為其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藍圖之他者的「中國」，向來不抱好感，<sup>20</sup>而這份惡感——下文將會論證——連帶地也影響了本土派習慣把「中國」排除在其人的「世界(觀)」之外。這大概就是為何抒情傳統在本土文學史的論述裡常常被存而不論、或另眼相看的原因。<sup>21</sup>晚近針對

19 這裡用的詞是「衍生」(derivative)，強調的是生成的(generative)、或者延異的軌跡，而不是起源(origin)不可動搖、不容置疑的規定性；換言之，「中國」在衍生的過程中很可能從此土著、乃至本土化(安於成為「華」之對反的「夷」)。使用「衍生」的觀念對於「華語語系」(Sinophone)國度如何受容「中國傳統」的分析可參考筆者，〈設想台灣人的華語語系觀點：關於「中國」與「共同體」的提問〉，《台灣文學學報》34期(2019.06)，頁133-164。

20 戰後本土論述的形構與1970年代興起的反(思)「中國人離散」(Chinese diaspora)的「回歸現實」潮流互為表裡。相關分析可見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05)。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從其根本，就是本土身分最巨大的他者。而這種與中國對抗的意圖——不論其之指向是政治實體的「中國」，或者作為文化衍生物的「中國」——不免也使得在本土派的「世界」藍圖中，「中國」常常有意無意地被過度冷淡或情緒化對待。

21 陳芳明和張誦聖其實都指出，在台灣文學發展的過程中，的確存在一個傳承自中國文學史的「抒情傳統」；不過他/她們也都給予這一抒情的伏流諸如外來的、非在地的，乃至非寫實、順從於威權等價值判斷，而且將之侷限在現代詩、現代散文，甚至女性的範疇。見如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11)，頁448、454-455、461-463、465；張誦聖，〈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04)，頁45-50。

台灣文學史上的抒情論述、及其相對應的（非）模擬理論脈絡，已經有一些初步的討論。<sup>22</sup> 本文因而將重點更聚焦在第二組問題，也就是如何在「空間」主導的身分、乃至地緣政治之外，透過抒情的傳統，亦即「時間」的因素來反省台灣人存有的處境性與世界圖像。

而在這裡需要特別澄清的是，本文絕不是主張只要將中國納入、為本土增添些中國性，台灣人的世界地圖就會從此完整。相對地，本文所要反對的恰恰是這種在實證意義上獨尊數量的拼圖邏輯。這一點在以下的章節中將會詳細申論。而本文之所以如此在意「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的理由，一方面就如上述，是因為在台灣文學史上，抒情的傳統的確是一個長期被忽略的時間線索。另一方面，這脈時間的伏流之所以被忽略，本文以下將說明，首先實與台灣文學本土論結構文學史敘述的方法過於倚賴空間（符號）的律則息息相關；更進一步來說，這套空間的律則尤其把「中國」設定為本土的對立。而就因為本土論的這一些特徵，本文的強調「中國」其實早就內建在台灣文學的抒情發聲——總已經在台灣文學抒情的傳統——裡面，更有助於打開台灣文學本土論的邊界。

## 二、空間思維與「本土」的台灣，及其外

地處在東亞島弧樞紐位置的台灣，自從大航海時代以來，一直都是帝國主義者覬覦、競爭的對象，舉凡十七世紀中葉的荷蘭與西班牙在島嶼北部的決戰，十九世紀後期老大的清帝國在第一次中日戰爭時敗給新興的日本帝國而割讓台灣，二戰後中（華民國）美體制到冷戰圍堵的轉換底定了國民黨在台的威權統治，乃至於後冷戰的今天台灣地位仍舊是美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的重要籌碼。<sup>23</sup> 而帝國邊境的擴張、改換以至於後冷戰時代加速的全球一體化等所帶動的人群移動、或者滯留，即為《孽子》與《蒙馬特遺書》跨國場景的布幕。以《孽子》為例，先別說這部小說原就以遷台第二代的阿青為主述

22 比如筆者，〈抒情的政治、理論與傳統：重探一個台灣文學的批判論述〉，《中外文學》48卷2期（2019.06），頁169-226。

23 一個關於地緣政治如何牽制台灣的自主的扼要分析可見吳叡人，〈賤民宣言：或者，台灣悲劇的道德意義〉與〈比較史、地緣政治，以及在日本從事台灣研究的寂寞：回應班納迪克·安德森〉兩文，《受困的思想：台灣重返世界》（台北：衛城出版，2016.07），頁60-73、74-82。

者，故事中小玉恩客之一的林茂雄出生在戰前的台灣，戰爭期（1937-1945）被徵召到中國戰場，在東北（當時屬於滿洲國）擔綱醫護工作，而與當地女子結婚；戰後林茂雄一家移居日本經商，而在七〇年代伴隨日本在台的經濟投資（亦即鄉土派批判的美日帝國主義侵略），才終於回到故鄉，締結與小玉的這一段露水姻緣。換言之，詭譎複雜的地緣政治決定了台灣連續同時重層殖民的歷史，<sup>24</sup>而「台灣文學」包括語言文體、思潮典範、敘述視角一路到文學史觀等構成元素，不免都將輾轉在不同的國家或民族主義（statism or nationalism）、種族或階級關係相互傾軋的齒輪之間。

而台灣如此纏結在帝國之間的處境及由此衍生的疊印著不同強權印記的歷史，連帶使得它的殖民與去殖民工程亦格外眾說紛紜。政治學門出身的台灣史研究者吳叡人就指出，前一個時期土著化了的殖民者在下一個時期竟淪落為被殖民者的現象所在多有，戰後明清以來累代定居於台灣的漢人（對於原住民而言他們乃殖民者）與大陸移民政權的從屬關係即這種反諷典型的例子。<sup>25</sup>而這樣此一時彼一時的落差致使當下至少有原住民的、本省人（台灣民族主義）的與外省人（中國民族主義）的三套彼此扞格頗深的後殖民議程在台灣並行不悖。<sup>26</sup>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後殖民論述，就如吳叡人文章的標題所提示的，都只能夠是某種「黨派性」（partisan）觀點的表達；而為求真正將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的「共同世界」（common world）——一種成員相互處於差異位置而所見不同，但同樣都對「吾人」共同生活高度關注的情境——加以在地化，<sup>27</sup>亦即批判地繼承台灣民族主義的「台灣後殖民論述」其之真正落實，現階段仍作為諸黨派之一員的台灣民族主義者須力求己身的開

24 「連續殖民」與「重層殖民」的說法與論證見吳叡人，〈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的觀點〉，《受困的思想：台灣重返世界》，頁10-24。另，史書美（Shu-mei Shih）也提過「連續殖民（主義）」（serial colonialism）的觀念，見Shu-mei Shih, "Introduction: What is Sinophone Studies?" in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Shu-mei Shih, Chien-hsin Tsai, and Brian Bernardis, e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

25 見吳叡人，〈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的觀點〉，《受困的思想：台灣重返世界》，「重層的殖民歷史結構」與「差異的後殖民觀點」兩節，頁12-14。

26 同註25，頁13-14。

27 相關推論見吳叡人，〈民主化的弔詭與兩難？——對於台灣民族主義的再思考〉，《受困的思想：台灣重返世界》，頁32-33。

放，以此尋找與島內其它的後殖民提案「結盟」，進而「相互解放」的可能。

可以說，吳叡人同樣在探問差異的複數如何彼此締結一種混雜存有的世界觀的問題，延續他的提法，作為台灣民族主義在文化場域之衍生的「台灣文學本土論」，它固然也應該視自己與根源兩端點間延異的軌跡為一種批判的距離，而非將之抹消，偽裝自己代現或甚至等同於根源。後者這類接近歷史主義「以詩證史」的方法在台灣文學領域相當常見的現象，透露了這一學門原來屬於台灣國族締造（nation building）工程一環的事實，<sup>28</sup> 其之論述核心的特點可徵諸比如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以及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等先驅之作。<sup>29</sup> 簡言之，這些作品大抵都是秉持與中國乃至任何外來民族有所區別的「台灣立場」與「台灣意識」，而對於「在台灣社會條件的制約下進行的文學活動」進行的論析；其旨則是發揚台灣文學的「自主性」，因而可謂為一種「有意識地引導台灣文學向台灣這個座標回歸的文學論。」<sup>30</sup>

在這裡，研究者力求呈現台灣文學做為台灣島上土著化的人民，其民族精神連貫而且完整的體現這一意圖明白可見——

我們（按：指葉石濤與彭瑞金）之所以把戰前新文學與戰後的台灣文學看做是割裂不開的整體完全的文學，其原因在於我們認為台灣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環，而不是附屬於任何一個外來統治民族的附庸文學。<sup>31</sup>

台灣意識建基在島上的殖民地經驗之上，是被殖民的、受壓迫的共通經驗……

（葉石濤）提出「以台灣為中心」的看法，正是回應了當時官方（按：

28 蕭阿勳，《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12），頁48-69。

29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87.02）；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91.03）；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8.10）。

30 引文為游勝冠為「台灣文學本土論」所做的定義，見《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9.04），頁5。

31 葉石濤，〈撰寫台灣文學史應走的方向〉，《台灣文學的困境》（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07），頁13-14。本文乃葉石濤為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所作的書評。強調為引用者所加。

指國民黨政權)所依恃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民族主義。

確定這樣的空間意識後……<sup>32</sup>

而葉石濤等人將「台灣文學」處理成一套自我完足、獨立自主的民族傳統這樣的本土論觀點主導了這門學科往後30年的發展。本土論在認可台灣文學做為一種身分的合法性上其貢獻無庸置疑，但是一方面，儘管自我定位為「世界文學」的一員，然而由於孕育在戰後戒嚴的特定語境中，撕去「中國性」的標籤很自然地成為其首要的目標，而這波「去中國化」的潮流在當下更因為對岸的中國崛起而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就如陳芳明判定的，本土論之能夠確信台灣的自主性所根據的實為一套「空間」的思維，亦即研究者大多傾向視「台灣」為台灣文學本土論這一符號系統敷衍、實踐的封閉場域——如此一來，一個傾向抗拒「中國／性」，而對其他如帝國主義者如美、日在政、經與文化方面的宰制相對之下輕輕帶過的「台灣」空間於是誕生。<sup>33</sup>這一走向可謂為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史綱》的出版適逢1987年——本土浪潮的結果，但在後冷戰全球加速一體化的此刻，面對像是《蒙馬特遺書》這樣在地與他方連結愈來愈深，甚至根本不在本土寫、也不寫本土的作品，其之解釋力固然受到挑戰。亦即該如何重新多方面而且建設性地反省台灣與世界的連帶對本土論而言刻不容緩。

除此之外，在本土論者樹立單一民族主體慾望的背面，來自內部的族群、階級與性別弱勢發聲，乃至外部的在台日人或東南亞移民他者的挑釁或挑戰亦未曾稍歇。這於是造成台文研究始終高度、甚至過度糾結在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情況。面臨這樣的僵局，吳叡人所設想的理想的「台灣民族」——一個由包括殊異族群、性別、階級以及「在其他任何可能的基礎上分化出來」在內的「異質的個體或群體」，其人「在台、澎、金、馬領土的共同空間中，依照多元民主原則建立的政治共同體。」——<sup>34</sup>若它不只是個

32 陳芳明，〈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觀之建構〉，《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04），頁52-53。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33 台灣不得不與右派的美日保持連結的分析與反思可見吳叡人，〈反記憶政治論：一個關於重建台日關係的歷史學主義觀點〉，《受困的思想：台灣重返世界》，頁101-129。

34 吳叡人，〈民主化的弔詭與兩難？——對於台灣民族主義的再思考〉，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出版社，1997.10），頁34。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天方夜譚，那麼應該如何履現？簡言之，焦慮於主體性的膠著慾望，以及對中國的過度執著，乃是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論遭逢的兩個主要困境。為求從中解套，近來頗多學者陸續都呼籲「比較」的方法學，嘗試將台灣放在更大的空間座標系中，比如東亞、華語語系（Sinophone）以至於全球、世界，進行參照的「關係性研究」或者「關係的比較（學）」（relational comparison; comparison as relation）。<sup>35</sup>

不過相對於繼續在「空間」的話題上單方面執著，不如同時將「時間」也納入反思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議程一起思考；再者，如何重新問題化「台灣文學」與「台灣民族主義」兩造之間那個批判的距離，而讓「文學」成為吳叡人所說的那些「異質的個體或群體」介入「民族」這個在地化的「共同世界」其之「共同立場」（common ground）制定的管道，<sup>36</sup>亦在本文問題意識的射程之內。在方法上，哈若圖寧（Harry Harootunian）與王德威的理論將被借重。識者或要質疑，哈、王二氏一是馬克思派的日本歷史學家，一強調現代中國文學的自由主義傳承，（專業的、意識形態的）立場似乎徹底對反。不過有趣的是，同為所謂東亞「區域研究」專家哈、王，在他們差異的學術生涯中都強調「時間」所給予的，反思當代區域研究以及比較文學認識論基礎的重要啟示，而這份對時間的關注是本文之所以借重其人學說的首要著眼點。除此之外，台灣的現代性經驗原就充斥著日本與中國、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等迥異的國族乃至意識形態之競逐及介入，亦即在台灣的範例上，哈、王的距離或許不遠，這一表面上不很合理的並置其實是台灣混雜存有在知識上的一個類比。藉由其人的說法本文將指出，台灣現代文學（批評）史上首重的模擬（mimesis）及其衍生的寫實、再現的觀念，<sup>37</sup>其實是某種空間思維的展現，而提出時間一方面將有助於概念化「文學」與「民族」之間那段批判的距離，

35 「關係性研究」為黃美娥提出的方法主張，較具體的陳述可見〈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台灣文學學報》28期（2015.12），頁1-38；至於「關係的比較（學）」則是史書美的提法，見史書美著，楊露彥譯，張錦忠校正，〈關係的比較學〉，《中山人文學報》39期（2015.07），頁1-19。黃與史對於「關係」界定的方法及其倫理容或有不完全相同的理解，但基本上，兩人都希望經由橫向連結的方式締造台灣與世界的多元互動。

36 同註34，頁30-32。

37 台灣文學史上「模擬－寫實－再現」這一組主導觀念的開展和演變可參考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台灣小說生產》（台北：秀威科技資訊公司，2016.03）。

提出一個後設地檢視本土論之處於外的立足點；另一方面，其對於發現一種差異的共通性，以至於想像以混雜為本的世界觀亦富有啟示。

### 三、「世界」的限度：西方vs.其餘

#### （一）不斷放大的量尺：再現與比較台灣的難題

近年來台灣文學研究界興起一股嘗試透過比較文學或者建立關係性的方法，來真正落實葉石濤所謂「台灣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環」的企圖。然而就現階段的成果來看，研究者或者致力於蒐集、彙整證明台灣與世界其他區域存在關係的文獻史料，或者用功於發展一套讓台灣更容易和世界性的理論潮流接軌的方法學，能同時兼顧歷史材料與研究方法者仍然少見。在這個意義上，張誦聖（Yvonne Sung-sheng Chang）援用柏格（Peter Bürger）「文藝體制」（the institution of art）以及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文化生產場域」（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理論對於台灣文學史的演進所做的系列解釋因而值得重視。

大約自新世紀前後開始，張誦聖分別在許多場合和文章中都提出如何在變動不居的地緣政治框架中（shifting geopolitical frameworks）之間，重新「代現台灣」（representing Taiwan）的問題。<sup>38</sup>張誦聖對於定位台灣的焦慮源自於其在美國學院中「區域研究」（area studies）部門從事台灣文學研究的背景，她嘗謂，自從她那本英語世界中首見的台灣文學專論出版的1993年往後十年間，<sup>39</sup>台文研究在其他更強勢的台灣議題——尤其是解嚴後的政治轉型——以新電影為代表的視覺研究，與最重要地，大規模崛起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等之激烈競爭下，難免淪為邊緣：「這些高分貝題材……吸收了大部分西方學界裡原本就頗為有限的東亞（尤其是人力）資源。以文學創作為關注的台灣研

38 Sung-sheng Yvonne Chang, "Representing Taiwan: Shifting Geopolitical frameworks." in *Writing Taiwan: A New Literary History*, David Der-wei Wang and Carlos Rojas ed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7-25.

39 指的是Sung-sheng Yvonne Chang, *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究……陷入了低谷。」<sup>40</sup> 這樣腹背受敵的窘境成為有志於在國際舞台上繼續深耕台灣文學者不得不設法化解的難題，而此亦即張誦聖一方面重新界定台灣在華語語系、<sup>41</sup> 乃至東亞架構中「可比較」或「可參照」的節點位置，另一方面轉往社會科學領域汲取形構一套她認為理想的比較方法的理論資源的原因。

首先，對於台灣文學研究而言，若欲創構一個新的比較框架或參照系，必然將面對該如何處理自身與「中國」的關係的緊張問題。而這一點在作為冷戰戰略之一環的美國區域研究領域中尤其然。張誦聖指出，五〇到八〇年代間台灣之所以受到重視與其被當作「代理中國」（surrogate China）——比如不少研究中國民俗、社會的人類學家（不得不）到台灣執行田野調查——或者沿襲著五四自由主義精神的「另一種中國」（the other China）。而這一些「優勢」由於接踵而來的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台灣在解嚴後本土意識的抬頭，逐一失去吸引力和正當性；而在台灣強調本身「非中國」的歷史與身分的同時，卻也冒著在國際上失去可茲比較的參照系的風險。

針對此一此消彼漲的不利態勢，張誦聖擊劃了一個含括性更大的華語語系甚至東亞的比較框架，她立論的基礎為不論是華語語系的中國、台灣及香港，抑或包括華語語系與日本、韓國在內的東亞，其之現代文學的展開，都經歷或還在經歷一種因國族處於危難的「非常時期」，而迫使寫作的自主性難免為政治力左右、剝奪的「非常態」生產。<sup>42</sup> 而在這一個共通的時（現代）空（東亞）情境中，接連受到日本帝國和中國國民黨威權政府統治，並且依循著美國冷戰佈局的台灣，其重層殖民的歷史經驗可謂具體而微地呈現了現當代東亞盤根錯節的霸權競逐史，這幅張誦聖「代現台灣」的地緣政治構圖於是底定。而奠定在這張地圖上，張更進一步將台灣的非常態文學生產——根據她的定義，非常態同時包含朝向自主的常態邁進的那個過渡期——<sup>43</sup> 「擬象的」文學場域

40 張誦聖，《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頁4。

41 由於華語語系是北美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圈相當晚近的重新範疇化，主要著作完成於九〇到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間的張誦聖，大概都以華文文學、華語圈或華人社會來翻譯她原文中的“Chinese literature”或“Chinese society”等語彙。而由於張誦聖同樣強調海（域）外華文文學自成一格的生成脈絡，為求討論上的簡潔清楚，本文亦將張的說法視為某種華語語系立場的表達。

42 張誦聖，〈台灣冷戰年代的「非常態」文學生產〉，陳建忠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05），頁17-38。

43 同註42，頁22。

或隱或顯抵抗著外界的如政治因素入侵的實踐，<sup>44</sup> 視為柏格與布爾迪厄等社會學者所提的一般性理論的一個案例（case）。<sup>45</sup>

在這裡，張誦聖之「用理論」的出發點似乎與史書美頗為契合。史書美在許多場合中反覆主張，台灣文學研究者應該視挪用西方理論而與之對話為一種提高台灣文化「重要性」（significance）的方式；<sup>46</sup> 亦即不妨（權宜地）將「西方理論」看成一個具備「普世」意涵的界面。然而如此一來，不管論者本人願不願意承認，「西方」總已經暗暗被等同於普遍的「世界」。<sup>47</sup> 在這個意義上，張誦聖論述中暗含的「世界—東亞／華語語系—台灣」連鎖遂浮現出來。

至於該如何對待「文學」文本？首先，張誦聖一直以來都強調「現代主義」作為華語語系乃至東亞文學最關鍵公分母的地位。<sup>48</sup> 而其之所以如是主張，不僅因為現代主義乃一種順著全球化的潮流繞行世界的普遍文藝現象，且更由於張認為，現代主義者對於文學的基質「語言」它作為一套論述機制的虛構或後設性質，有著敏銳的警覺；在這個意義上，現代主義文學者對於為一己的語言所造作、投射的「真／現實」（reality），總抱持一種反身的（reflexive）不安與懷疑。<sup>49</sup> 將這個帶有解構意味的反身性放置到張所謂追求自主的非常態文學生產這一語境中，現代主義文學能夠洞穿那個如其所使用的語言般，都是由某個特定的論述機制派生而來的既成規範，其之虛構本質的洞察力，不啻為反叛干擾文學場域獨立地位的外部因最有力的法門。

張誦聖的近作〈郭松棻〈月印〉和二十世紀中葉的文學史斷裂〉頗為確實

44 對於張誦聖欲透過文藝體制、文化生產場域這類文學社會學的理论來建立非常時期的東亞文學共通的解釋架構這一嘗試，最直接的挑戰即為，既然是政治力高度滲透、乃至直接介入的非常態文壇，那麼獨立自主的文學場域該如何論起？張在最新的〈戰時台灣文壇：「世界文學體系」的一個案例研究〉，《台灣文學學報》31期（2017.12），頁1-32，一文中，在涉及自主性時，以在文壇或文學場域等詞彙前加上「擬象的」，做為折衷的處理。

45 Sung-sheng Chang, "Representing Taiwan." : Shifting Geopolitical frameworks." in *Writing Taiwan: A New Literary History*, pp.17-25.

46 Shu-mei Shih,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 significance of Taiwan."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6, No.2 (2003), pp.143-53.

47 見陳春燕對於史書美的批判，〈非關認同：從儂曦、舞鶴談「共時性」的倫理〉，《中外文學》35卷5期（2006.10），頁125-128。

48 比如張誦聖，〈談談幾個研究「東亞現代主義文學」的新框架：以台灣為例〉，《台灣文學研究集刊》5期（2009.02），頁41-58；張誦聖著，金林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與全球現代性：以台灣新電影的三位作者導演為考察中心〉，《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8期，頁115-123。

49 這個主張散見於張誦聖大部分的研究，比如 *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hap.4.

地演練了上面分析的她的理論意圖。<sup>50</sup> 在該文中，張誦聖一來延續她以往將台灣視為另一種中國的看法，<sup>51</sup> 亦即視1949大分裂後的台灣銜接著在大陸敗北的自由派傳統；但同時她也承認，這個中國文化的傳承隨著六〇到八〇年代島內政治、社會局勢的改變，而愈來愈在地或者本土化，以至終於形成一個對立於對岸社會主義中國的「台灣」空間。至於生成這一「斷裂」（rupture）的歷史過程，它有著「介入vs.非介入」的公民倫理牴牾、以及冷戰與愛荷華寫作班這樣世界規模的背景，也存在如國共內戰和中日戰爭這類座落在華語語系及東亞的事件，而且與六至八〇年代台灣文壇的知識氛圍多有連結。

更重要的是，對於〈月印〉（1983）這篇透過高度藝術化的形式，一方面展演左右意識形態交錯，另一方面重新盤整包括日治時期和二二八在內的台灣獨具的歷史創傷的小說，張誦聖認為它當之無愧於「嚴肅的現代主義作品」，而究其經營敘述的用心，則「可視為是透過美學化象徵的方式，來再現現實世界裡的衝突，從而將它駕馭管控的過程。」<sup>52</sup> 換句話說，在這裡，郭松棻之寫作〈月印〉實標記著非常態的台灣文學場域，終究長成的獨立於政治等其他場域的自主性。進而言之，來自台灣的〈月印〉案例，在它展現了不凡的成熟度這個意義上，允能夠成為過去20年來，不論在中國或者台灣都海量出現的有關非常時期暴力事件的代現（representation）書寫，其之比較研究的一個基準。

## （二）進入「世界」的門票：認可的技術與另類的誘惑

在前一小節的分析中，本文已經揭示那張內建於張誦聖比較議程中的「世界—東亞／華語語系—台灣」地圖；這張地圖不僅為物理空間上的，同時也不免是知識位階上的，亦即（情願或不情願地）認可西方理論的「普世性」。張的策略，易言之，就是嘗試經由將被孤立的小島台灣重新納入較大（華語語系／東亞）以至於最大（世界）的空間範疇中，而期待恢復台灣文學應有的能見度。這樣的作法於情於理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它對於為強權所宰制的地緣政

50 張誦聖，〈郭松棻〈月印〉和二十世紀中葉的文學史斷裂〉，《文學評論》2016年第2期，頁169-176。

51 同註49，pp.19-22. 張誦聖基本上認為戰後台灣繼承著五四的自由派傳統。

52 同註50，頁175。本段話源於張對於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說法的詮釋。

治流露的妥協心態，似乎有反而事與願違地馴化或規格化台灣文學的能動性之虞。<sup>53</sup> 另一方面，它也容易落入當代理論特重「空間」而扁平化「時間」的泥淖。這些缺點在張誦聖援引「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的框架，加以理論化戰爭期(1937-1945)台灣文學場域的文章〈戰時台灣文壇：「世界文學體系」的一個案例研究〉中，清楚地被呈現出來。

「世界文學」是晚近在比較文學界頗為盛行的理論提案。然而它實際上不算是一個新的說法。早在十九世紀上旬的1827年，歌德就率先提出“Weltliteratur”(德文「世界文學」之意)的理念，而後康德、黑格爾與馬克思等哲人紛紛呼應，相關談論此起彼落而形成可觀的脈絡。<sup>54</sup> 不過後來隨著歌德等設想的「世界」備受(尤其來自「後學」的)歐洲中心主義的批評，世界文學之說於是也消沉了下去。而近來世界文學之重新被提起，與比較文學界因應全球化浪潮下民族國家邊界的約束力減弱，區域之間整合度大幅提升，而亟需一個更具含括性的概念框架這一欲求息息相關。但是在這種將個別民族乃至區域同時收納到一個愈來愈大而且單一的「被概念化的空間」(representation of space)——<sup>55</sup> 不管它是「世界」、「全球」或「行星」(planet)——之內的企圖中，一種被哈若圖寧批評為重蹈「西方vs.其他世界」(the West vs. the Rest)這一冷戰二元論思維覆轍的空間的謬誤，<sup>56</sup> 抑或

53 即陳春燕批評的：「史(書美)並未交代：『全球化』、『普世化』最後是否殊途同歸，一致指『西方化』或『被西方理解』。」與「史書美或許根本沒有別的語言可以描述台灣，因為放眼望去，台灣一逕都只在身分認同政治的架構中具有意義；『台灣』等於『認同政治』。」見〈非關認同：從儂曦、舞鶴談「共時性」的倫理〉，《中外文學》35卷5期，頁126-127、128。

54 「世界文學」的論述脈絡可參考Pheng Cheah, *What is a World: O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Introduction;" 台灣學界(土產或引進的)對這一議題精彩的討論、回應也不少，強調時間性的王德威，《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2015.07)；特出(新)媒介([new] media)「質」的作用的陳春燕，〈意義遲後：文學的當代位置〉，《英美文學評論》28期(2016.06)，頁101-129；與後殖民立場強硬的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06)——恰可標誌三種應(反)對世界文學空間的、量化的、標本主義(tokenism)的姿態。

55 本文參考了陳春燕對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這個詞彙的譯法，見〈時間與他者：後殖民全球化的當下〉，《英美文學評論》13期(2008.12)，頁142。

56 哈若圖寧(Harry Harootunian)著，王梅香譯，〈對可比較性與空間—時間問題的一些思考〉，陳春燕、劉紀蕙編，《歷史的記憶與日常：資本主義與東亞批判研究——哈若圖寧選集》(新竹：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12)，頁144-146。嚴格來說，西方優越於其他世界的階序性(hierarchical)思維可能貫穿整個現代(性)的歷史，收錄在《哈若圖寧選集》中，尤其是第I部分，的文章可證明這一點。但這套思維形成一套「自然」不過的體制，與冷戰時期創建的現代化理論及區域研究緊密關聯。

王德威以「根的政治」稱之的位置的、身分的政治僵局依舊不請自來。<sup>57</sup>

在該文中，張誦聖批評世界文學雖高談包容與多元，東亞現代文學受到的注目仍舊遠遠低於它實際上應獲得的。「翻譯」（為主流的英、法文）得不夠是原因之一，而「整合」得不徹底亦責無旁貸。張誦聖如此說道：「我們缺少將東亞地區視為一個整體、辨認並釐清具有區域性特質的文學發展動力、流通路徑和演化模式的系統性綜合考察。」<sup>58</sup> 而一旦研究者開始將「東亞文學」當作一個統合的實體，或者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建議的將「文學空間整合」（the unification of literary space），東亞現代文學就可以順理成章承接《世界文學共和國》（*The World Republic of Literature*）一書所頒定的「被所有競爭者都無條件認可的一個絕對的參照點（point of reference），一套測量時間的共通標準（a common standard of measuring time）」，亦即所謂「文學的格林威治子午線」（the Greenwich Meridian of Literature）。<sup>59</sup> 在這一套體系下，儘管因為東亞現代文學非但後進（belated），同時必須跨越語系與文化的扞格而非常難達致及格標準，不過張誦聖建議先別急著以成品（product）的成敗來論英雄，而更該把注意力放在過程（process）所透露的東亞受容西方現代文學的多元性上面。如此一來，東亞現代文學便能夠以更整體的型態被納入世界文學的共和國，而非過往的總是只有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或者高行健等諾貝爾獎得主才具有入場券。

究其實質，雖然強調莫以成敗論英雄，不過張誦聖的提法非但沒有挑戰那套格林威治標準，而是恰恰相反地默認了其無庸置疑的合法性，終於將「台灣」及「東亞」打上引號，安放在由世界，或者直言之，西方，所建構的文化奇觀博物館——一套再現機制的物質體現——之中。在這個意義上，張的理論射程基本上沒有超過早先史書美已揭露且審視的預設在全球文學體系裡的那套

57 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頁22-34。

58 張誦聖，〈戰時台灣文壇：「世界文學體系」的一個案例研究〉，《台灣文學學報》31期，頁6。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59 Pascale Casanova, *The World Republic of World letters*, trans. M.B. DeBevoi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87. 這也是張誦聖〈戰時台灣文壇：「世界文學體系」的一個案例研究〉援用卡薩諾瓦的前提，見頁4。

「認可的技術」(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sup>60</sup> 這套涉及現實制度與心理認知層面的技術促使西方在學院或大眾媒體、在社會或文化場域等「再現的界域」(the realm of representation)中，都能夠劃分本身和非西方在所謂世界中的主從角色與優劣位置。而這也正是張誦聖附和或負荷的那套世界文學標準其之根柢。<sup>61</sup>

史書美進而表示，在西方刻正祭起全球或世界這類包山包海的大旗時，其實並未反思、更遑論推翻既有「西方vs.非西方」這套再現的界域中內建的歷史或政治的、種族或民族的非西方他者／奴隸，在階序(hierarchy)上從屬於西方主體／主人的上下關係，<sup>62</sup> 而逕把其中作用著的權力結構轉嫁到文化差異之上。而這正是現正流行於全球化主義者之間的「多元文化主義」口號其之世界觀的前提。與此同時，史書美也援引高行健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後引發的爭議為例，對於在後冷戰時代蛻變為西方最大他者、甚至挑戰者的中國，其之貶低「寫在家國之外」的離散的華文文學——<sup>63</sup> 亦即史所謂的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為不正統，<sup>64</sup> 中國無法為其所代表的宗主國心態，嚴厲針砭。這也是史書美後來「反離散」(against diaspora)主張的先聲。<sup>65</sup>

而就如王德威點出來的，史書美的反離散論述將中國視為雖然是離散者所來的根源，但華語語系終究才是離散者落地生根的地方，這樣兩相對立的談法，反映的毋寧是一種「空間／位置的政治」(spatial and positional

60 史書美著，紀大偉譯，〈全球的文學，認可的機制〉，《清華學報》34卷1期(2004.06)，頁1-29。本文參考紀大偉的中譯，但在部分名詞的譯法上有所修改。特別是將“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譯為「認可的技術」，以及“the realm of representation”譯為「再現的界域」。

61 必須稍做澄清的是，張誦聖對於採用所謂世界文學標準的危險性並非懵懂不知，但即使萬般不願意，她終究認為「百年來競逐於東亞文學場域中的美學位置，多數銘刻了西方文學楷模的規範性印記。」同註58，頁7。

62 同註60，頁4-5；在這裡史書美批判以黑格爾主奴辯證法為根柢的西方(殖民)主體論述。

63 「寫在家國之外」(Writing Diaspora)為周蕾的提法，《寫在家國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07)。

64 如果以第一本華語語系文學專書Shu-mei Shih, *Visibi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寫作的時間來看，史書美“Sinophone literature”概念的敷衍大概從九〇年代晚期就開始醞釀。而“Sinophone”之中譯為「華語語系」的初次提出乃於〈全球的文學，認可的機制〉。根據史書美，「華語語系」的譯法是她提供給紀大偉的建議，見《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集》，頁9。

65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集》，頁27-52。

politics)，或者說，「根的政治」。<sup>66</sup>而在這個意義上去斷言「離散有其終時」，<sup>67</sup>難免將經驗的主體強硬切割為離散終止的前與後兩個彼此無涉的階段；換言之，時間——經驗之能形成的痕跡——的綿延（duration）被空間化為「中國認同」與「華語語系認同」兩個對抗的場所。至此時間不再有流變遞嬗出多元存有的可能，存有已預先被二元的身分的屬性給限定；一個阿岡本所謂生活於眾的（the many）同感（common sense）中的「經驗主體」（subject of experience）為理性、單一（the one）的「科學的主體」（subject of science）所取代的存有的現代形式，<sup>68</sup>在這裡找到了它的華語語系對應。

而依照史書美的構想，華語語系文學一方面應該相互結盟來抵抗中國的收編；另一方面，華語語系文學為求抵中國而取得正當的民族文學身分，它也必須主動投入在地的本土文學生產。即使史的立意良善，然而這樣的主張很難不被看作是一種低估中國影響力且對無所不在的種族主義太過樂觀的烏托邦言說。其實在石靜遠使用「文學治理」（literary governance）加以描述的，離散華人社群因為政治、經濟抑文化等因素，不得不或志願地和中國（China）、中文／中國人（Chinese）保持交往的曖昧脈絡底下，中國性的問題勢必更為纏繞糾結——<sup>69</sup>就如王德威以新加坡為例所指出的，在史書美的定義中理應是華語語系「弱勢」（minority）的這一城市國家，在外交上與其他華語語系社群維持的反而是「遠交近攻」的親中國路線。<sup>70</sup>

在抵中國的議程之外，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先別論現實中的可執行性，而單就理論來談，史書美這樣闡連（articulate）華語語系為全球文學中的一種身分、一派陣營的提法，果真足以質疑、挑戰「西方vs.非西方」這

66 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頁30。

67 同註65，頁47-48。

68 Giorgio Agamben, *Infancy and History: The Destruction of Experience*, trans. Liz Heron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7), p.20.

69 Jing Tsu,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esp. Chap.1.

70 王德威，〈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台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頁15。

一再現的界域嗎？情況可能沒那麼樂觀。哈若圖寧同樣重視人文研究中西方（the West）與其他世界（the Rest）間的「可比較性」是如何成立的問題，而如同史書美，他也強烈不滿於比較研究中牢固不破的「西方vs.其他世界」二元階序，而且都視區域研究為這個不平等最直接的徵狀。而哈若圖寧更進一步為這一二元論在知識上的基礎找到除了歌德或黑格爾之外可能更根本的淵源，即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在該書中，韋伯從文化，特別是宗教，的角度申論歐洲前現代的價值觀其實接軌著現代社會的核心精神這樣頑強的連續性，從而雄辯地否認了馬克思辨認出來的那道由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所造成的歷史的，亦即時間的，革命性斷裂。而當流轉歷史的推動力從生產工具的汰舊換新轉變為文化精神內在的共生組態（configuration），那麼原來發生在西方的前現代與現代這一時間的改朝換代，也就能夠「自然地」被換喻為西方和非西方的其他世界兩造空間文化本質上的差異。<sup>71</sup>

換言之，「西方（現代）vs.其他世界（前現代）」如此「空間化的時差」在現代性論述萌芽的時期早已根植。在那裡，包括民族國家、資本主義乃至強迫異性戀機制等由它衍生而來的體系，為了合理化西方文化主體從前現代過渡到現代的一致性，其他世界遂必須被擺放到前現代、文化他者的相對位置上；而當這一構圖成立，其他世界就註定要在追求現代性的賽跑中扮演一個永遠慢了西方一步甚至多步的「發展遲後者」（late developer）。<sup>72</sup>哈若圖寧因而堅持，包括「另類」（alternative）現代性、後現代或者文化研究等在內的獨尊空間——在這個意義上，史書美及張誦聖的論述固然也在哈若圖寧的射程之中——的談法對於革新人文研究乃至比較研究其實無濟於事，因為其之研究取徑不但無能反叛，反而還複誦著那套根深柢固於現代性論述中的空間化時差。

#### 四、異質時間與「世界中」的「台灣」文學

在前一節中，本文檢視了近來主要的幾種以本土論的角度探討台灣文學

71 哈若圖寧，〈對可比較性與空間—時間問題的一些思考〉，《歷史的記憶與日常：資本主義與東亞批判研究——哈若圖寧選集》，頁144-146。

72 同註71，頁146。

的世界性的方法主張，<sup>73</sup>而發現它們基本上都還是在空間理論的主導下思考如何代言／再現（represent）台灣。不過一方面，就如哈若圖寧揭發的，這種比較的方式對於隱匿在西方現代性論述核心之處的「西方vs.其他世界」二元階序欠缺批判性，甚至存而不論；若然，比較台灣終究只是再度合理化西方的地緣政治佈置，以及它認可、再現另類文化的技術與機制。另一方面，受困於這類推崇空間邏輯的談法，白先勇和邱妙津作品所暗示的，那個由處於外的位置對於「台灣」共同立場、共同體的玄思，將繼續被擱置不論——一來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格局據稱涵括了整個世界，現已不再有工具理性的量尺（如資本）無法符號化空間，不可再現的神聖經驗、語言不可述的「外邊」都消失於吾人的世界觀；<sup>74</sup>再者，如同王德威的批評所示，從本土論、反離散的立場來看，唯有先扎根在台灣民族主義的符號系統之內，一位作者、一篇作品才能獲得代表台灣與世界進行比較的入場券。簡言之，空間走法的比較路徑似乎仍繞不出困住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認同、認可政治難題，以至於模擬與再現的窠臼。

然而須要澄清的是，不論是王德威或者哈若圖寧其實都不是要徹底抹消空間取向的理論其之批判可能的建樹——王德威呼籲透過海德格將空間時間化的「世界中」（worlding）提法，以求在全球語境中重建中國或華語語系文學「時間與空間的互緣共構」（Architectonics of Space and Time）；<sup>75</sup>而哈若圖寧也援用班雅明「引述」（citation）等觀念，訴求「對於那個必得參與在任何（有關世界的）解釋提案之中的，極為重要的時空關係的思考其之恢復。」（a restoration of consideration of crucial spatiotemporal relationships that must attend any explanatory program.）<sup>76</sup>換言之，對於時空關係究竟該

73 識者或要質疑將張誦聖、史書美等立足點不盡相同的學者都歸為「本土論」的合法性，本文基本上採取比較折衷的作法，只要論者秉持台灣「事實獨立」（de facto independence）的立場，亦即「台灣」自成一個空間意義上的符號系統，則不論其較接近「華獨」或「台獨」，都納入討「本土論」的系譜。

74 相關理論說法可見陳春燕，〈全球情境，荒人觀點〉，《中外文學》37卷1期（2008.03），頁117-152。

75 David Der-wei Wang, "Introduction: Worlding Literary China," in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ed. David Der-wei Wa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1-17.

76 哈若圖寧，〈對可比較性與空間：時間問題的一些思考〉，《歷史的記憶與日常：資本主義與東亞批判研究——哈若圖寧選集》，頁146。譯文經我的修改。

如何重新闡連、又怎麼能夠成為一種文學的分析方法，哈若圖寧和王德威都在各自關注的「其他世界」——前者為日本，後者為中國或華語語系——之外，同時涉獵大量西方理論以建構新的結合時間與空間的比較方法。本文嘗試透過一些同樣關注時空關係之重建的東亞在地學者相關的討論來回應或延伸他們的說法。而一如並列哈若圖寧和王德威兩位領域及方法論都差異頗大的學者，以期觀照台灣存有之展開的重層脈絡，同樣地，以下所徵引的研究成果不拘於以台灣為主要論題者，而是將台灣的「傳統—現代」轉型放在較為廣闊的東亞時空中加以評估。與此同時，雖非嚴格的繫年，下面的討論仍試圖標記出幾個台灣史重大的轉折期——（一）十九世紀末的現代初期、（二）戰後初期的1945-49，與（三）同志文學暗示的八〇年代的政治改革期。

在進入正題前，先就本節標題上的「世界中」（worlding）做簡單的解釋。<sup>77</sup>「世界中」的說法來自海德格，對海德格而言，「世界」不只是一個實證的、客觀的（objective）空間，而更是在被拋的「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其之展開（unfold）的過程中彰顯——海德格的名言：「世界成為世界（“The world worlds”）」——<sup>78</sup>在這個意義上，「世界」其實是一個存有自我表述的動態過程——換言之，「世界」總是處於「世界中」的開展動勢——與其視之為實存、可丈量的地理空間，不如將它看成是存有在時間之流中生成的力量（generative force），透過這股生成的力量，在世存有始能如其所是地成其所是。而在海德格的思想中，詩人，尤其抒情詩人，最是能夠顯露世界生成的、「世界中」的力量。<sup>79</sup>海德格對於「世界」的解法對於本文深具啟發，一方面，它在理論上愈加強化了本文之強調「抒情」傳統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從「世界中」的角度看來，作為存有形式之一種的台灣人實不必自限

---

77 “worlding” 是海德格學說中重要的觀念，散見於他的許多著述中，本文主要就著〈藝術作品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一文進行解析。Martin Heidegger,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in *Off the Beaten Track*, trans. and eds. Julian Young and Kenneth Hay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56.

78 Martin Heidegger,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Being and Time*. Trans. Joan Stambaugh. p.35.

79 在海德格的思想中，世界中的真理須仰賴藝術品的中介始能解蔽、顯露，而詩所能產生的效能特別受到倚重，比如在〈藝術作品的起源〉有不少段落都類似的宣稱：「倘若所有藝術的本質都是詩，那麼建築、視覺藝術以及音樂必然都回頭指涉作詩的方法。」與「藝術的本質是詩。」見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Being and Time*. Trans. Joan Stambaugh. p.45, 47。

於身分政治所規定的符號律則，乃至地緣政治意義上的世界（空間）秩序；相對地，就如以下的討論將呈現的，台灣人存有總已經內建著橫跨多個地緣政治框架的複數時間感（temporalities）。而這樣的時間感知正是白先勇與邱妙津等台灣人的抒情發聲，其之生成力量的淵源。

### （一）「不同時代的同時出現」：複數時間感的眾聲喧嘩

柄谷行人在《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中談及，<sup>80</sup> 旅英後的夏目漱石在鉅作《文學論》（1906）中透露「有著彷彿被英文學所欺瞞之不安念頭。」<sup>81</sup> 柄谷指出，這種被欺瞞的不安是出於漱石清楚意識到，內建在所謂「英文學」之中的那套以歐洲為中心的透視法（perspective），而藉由這個單一觀點所描繪的「風景」，是一個時間已被直線時程（linear history）所決定的均質化的空間；<sup>82</sup> 在這個意義上所產生的日本「國文學」不過是英文學派生的附庸——亦即哈若圖寧所說的，乃是「經歷過帝國主義幽靈強迫施加的某種殖民或臣屬形式」的「世界上歐美之外的民族」，其人「被迫以比較的方式過生活（live lives comparatively）」的結果——<sup>83</sup> 而敏銳察覺「文學」（literature）後設的虛構性的漱石，他洞穿的更是蟄伏在「近（現）代／文學」後的那套「西方 vs. 其他世界」的二元階序其之機制。

而在覺悟了這一點後，漱石並沒有搖身一變為反西方、反近代，而形成另一種二元對立態勢的基本教義派的（fundamentalist）傳統主義者，這種本質論的論法是後來日本「浪漫派」的法西斯走向；<sup>84</sup> 相反地，漱石憑藉著超凡的毅力與才華，而處身在日本傳統的和歌、俳句與漢詩／文學，和英文學＝近代文學等多種不同的時間感——不只是並讀、而且兼顧這眾多文類的創作——

80 柄谷行人，《定本 日本近代文學の起源》（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08.05）。中譯參考柄谷行人著，吳佩珍譯，《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7.12）。

81 夏目漱石，〈文學論·序〉，引自註80，頁13；中譯本頁30。

82 柄谷行人，〈風景の発見〉，《定本 日本近代文學の起源》，頁5-35；中譯本，〈風景的發現〉，《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頁21-52。

83 哈若圖寧，〈對比較性與空間—時間問題的一些思考〉，《歷史的記憶與日常：資本主義與東亞批判研究——哈若圖寧選集》，頁136。

84 大貫惠美子著，堯嘉寧譯，周俊宇審定，《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09），特別是第十與十一章。

之中。<sup>85</sup> 易言之，稱漱石的寫作生涯真正體現了布洛赫（Ernst Bloch）所謂「不同時代的同時出現」（contemporaneous non-contemporaneity）絕非誇張之詞。<sup>86</sup> 另一方面，王德威在解釋“the lyrical in epic time”一詞時提出，“time”在英文中除了是時代與時間以外，同時可以指陳韻律和節奏；換言之，「抒情」的表述總已經夾帶公與私雙重的時間律動，個我與時代相互闡發、牽連（mutual implication），抒情闡連（lyrical articulation）是個體的表情達意，亦為對於公共議程的介入干預。在這個意義上，這一容納著多元時間維度的寫作，亦不妨被視為夾帶著所處之境韻律，而抗拒其間主流的宏大敘述格式化再現的「批判的抒情」（critical lyricism）。<sup>87</sup> 也因此，「抒情」的聲音總已經夾帶著「史詩」的時代感。而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指向漱石的寫作所展現的，一方面傳統與現代（時間）、東方和西方（空間）交錯混雜，而另一方面，在故事敘述（時間）中容納著重層社會階層語言（空間）的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sup>88</sup> 這樣有著深刻反身性的時空連帶。

也因此，儘管柄谷行人認定在明治20年代（1887-1896）後，隨著欽定憲法公布、言文一致奠定與國文學建制化，類似漱石這樣能同時處在不同時間感中而且兼備各種文體的文人逐漸消沉，而日本近代文學終於無法抵擋西方強勢文化的洪流，逐漸被其他世界的身分標籤給同一了（identified）。這個時間空間化工程的竣工可以自然主義的私小說在文壇上取得正統性為里程碑，自此之後日本近代文學已完全被現代性給馴化，無能為力地順應著西方與其他世界的角色分配。不過這樣認為時間已因循著空間的符號規律，故而對於改變現況無能為力的看法，<sup>89</sup> 顯示出柄谷在這裡改而走向其實與在處理漱石範例時，更

85 同註80，尤其〈風景の発見〉，與〈ジャンルの消滅〉（〈文類的消滅〉）兩章有關漱石的分析。

86 同註83，頁160。

87 “the lyrical in epic time”的多音複旨見王德威，《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7.10），頁8-9；「批判的抒情」比較完整的討論可見王德威，《茅盾·老舍·沈從文：寫實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9.07），第六章。

88 柄谷行人、哈若圖寧和王德威都對巴赫汀（Mikhail Bakhtin）的學說，特別是《拉伯雷研究》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詩學問題》等，頗為推崇。

89 這基本上也就是（後）結構主義的取徑——亦即改變的可能只在於空間—符號的革命——只是不同的理論家對於那套符號規律有不同的指稱。柄谷行人在這裡借用了卡西勒引申自康德的「象徵形式」（symbolic form），《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頁36。

著重在鉤沉時空關係的連帶有所違背的傾向空間的路徑。但無論如何，柄谷行人終究為重建作為其他世界之一環的東亞近（現）代文學其時空關係的議程，提出富有啟發的一步——亦即必須去恢復根植在其「起源」處的混雜與眾聲喧嘩，而不是一味套用西方的格林威治標準來衡量自身註定遲後的「現代（性）」。

《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影響深遠，柄谷行人企圖透過日本文學所經歷的現代轉型，加以描述現代性的構造，進而期待照見可能的出路。在他為台灣譯本所寫的序言中，柄谷行人指出，對日本、乃至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展都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柳田國男，其之民俗學志業起源於「甲午戰爭之後，他認識了台灣的原住民」。<sup>90</sup>也因此，「台灣」，這座島嶼不合於日、中民族主義教條的異質世界觀，或能為當代的吾人重建斷裂的時空關係帶來啟發。

## （二）超越地緣政治的時間伏流

而若依照這條線索反思台灣文學本土論及其比較研究，則除了已流於公式化的、對其單一族裔和語言的本質主義預設之類的批評，還可發揮的或許是在根的政治式的與中國對抗，以及把台灣納入華語語系乃至世界以求締結關係等特重空間的取徑外，本土論有沒有發展時間與空間互緣共構談法的可能？陳翠蓮最新的再探戰後台灣民族主義的起源二二八事件的重要著作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切入點。<sup>91</sup> 在本書陳翠蓮率先指出，既有的、包括台灣與中國版本在內的民族主義者，其人以台人和大陸人隸屬對立的省籍族群，而因統治模式差異遂生衝突的這種看法來解釋二二八，實在簡化了事件的複雜度。<sup>92</sup>

根據晚近公開或新出土的史料，二二八歸根究底乃是在陳翠蓮所謂「戰後美中體制」下，美國與國民黨政府協商以至於角力過程中的一次偶發事件。陳之戰後美中體制意謂的是美國在二戰結束後，選擇扶植國民黨政府為自由民主政體在東亞的主要代表者，以求孤立日本的國際結盟；這與同一時間已逐漸展

90 柄谷行人，〈台灣版序〉，《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頁8。

91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台北：衛城出版，2017.02）。

92 同註91，頁12-17。

開的冷戰體系有著微妙差異——<sup>93</sup>前者圍堵的是東亞區域秩序可能的挑戰者日本，而非後者的意識形態互斥的蘇聯或中共。<sup>94</sup>鞏固和國民黨政府的結盟既然涉及美國在戰後東亞的整體佈局，於是即便國府與陳儀等有意無視開羅宣言為台灣地位保留著的過渡性，顧及長期的戰略及利益美方大抵都不予追究。<sup>95</sup>

表面上陳翠蓮執行的不過是另一套將台灣放入更大的地緣政治裡的做法。不過專治台灣史的陳翠蓮在處理「戰後美中體制」這個符號系統時，看重的不只是剖析它律則的運作模式，而更著力在處理其為何、且如何生成的歷史過程。於是故，陳翠蓮這本書的分析大抵力求呈現那促成個體或集體的行為者，其當下所做的判斷必然有著的，訴求一致、或至少可溯的前世今生。簡言之，二二八事件裡美、中、台的各路人馬，其所居之「地圖」上的對立或協力的節點，非僅僅為差異的地緣政治利益所決定，而還牽涉該行為者在不同地緣政治秩序間連續一貫的思維與生活經驗。

換句話說，若要討論戰後美中體制的律則，也該納入戰前中國政府的統治模式、及戰時期美國的戰略考量一併考慮。另外，像對於一直鼓吹美國應介入地處要津的台灣其之歸屬問題的葛超智（George Kerr），儘管他的論述始終貼合美國軍方的設定，但曾秘密以情報員的身分任教於台北一高，因而結識不少後來主張台獨的本土精英的葛，其人日常的生命經驗，或許奠定他同情台灣的立場情感的基礎。<sup>96</sup>陳翠蓮這裡的提法實存在著與哈若圖寧提倡的給予「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之「節奏」（rhythm）更多的關注互相連結的可能，而哈若圖寧之所以著眼日常生活，在於提示在革命性的事件——符號秩序的徹底轉變——之前或之外，日常生活的經驗其實一直延續、騷動，它始終示範某種異質的時間感，而和主導的符號律則進行周旋、抵抗。<sup>97</sup>另一方面，當

---

93 同註91，頁21-22。一般而言，冷戰被認為開始於1947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援助希臘、土耳其以免其赤化的法案，即後來歐陸馬歇爾計畫的前身；但台灣要直到1954美中軍事協防條約訂定後，才真正被納入冷戰體制。

94 同註91，頁21。

95 同註91，頁76。

96 葛超智本人與台灣的淵源，及其人論述和美國軍方思維的合拍見註91，〈美國與二二八事件〉一章的分析。

97 見陳春燕對哈若圖寧提議日常生活的分析，〈時間與他者：後殖民全球化的當下〉，《英美文學評論》13期，頁138-141。

王德威談論「二十世紀中葉」中國共產黨革命前後知識人和藝術家的抉擇時，他同樣在處理抒情自我的生命經驗（the lyrical）如何在大時代的律動節奏中（in the epic time），闡連因革命而致使的斷裂、碎片；對王來說，抒情發聲作為政治介入或表演，<sup>98</sup>實帶有反省啟蒙、革命等現代大敘述所制定的時間議程之啟示。結合二氏的說法，亦即與其簡化地將抒情傳統視為區域研究的產物，不如轉而去鉤沉它在區域研究律則之前與之外的存有的異質性。

總而言之，就理論意義來說，陳翠蓮揭示了地緣政治的空間（重新）佈局總已是個歷史的過程，也就是時間的結果。台灣文學研究或能從這裡得到啟發，畢竟所謂連續、重層的殖民講的毋寧即地緣政治勢力的消長更替。雖然這般主張因果律的連續性難免招來有機論的誘惑，但對當前台文學界透過語言的從日文到中文、政體的從殖民到威權，與區域霸主的從帝國日本到冷戰美國，這系列從A到B來標誌戰前、戰後分屬兩套不同的符號律則，故而是斷裂的主流論法——它所依循的理路類似「西方vs.其他世界」的切割，都是某種把時間空間化的方法；基於此的「台灣文學」其之戰前、戰後不免帶有本質相背離的差異空間性——陳翠蓮說法的時空一體暗示仍帶來啟發。亦即將空間的地緣政治視為時間的動態綿延，透過日常生活的韻律與文學的抒情這些重視時間與空間互緣共構的分析方法，有助於恢復台灣文學／史的時空關係。

### （三）「世界中」的「台灣」文學

上述的分析一方面揭示非西方的東亞（包括台灣）後進的現代性中內建的異質時間感，另一方面則指出（個人、國家等）行為者之經驗在斷裂的地緣政治框架下伏流般綿延而來的連續性。這兩廂現象其實相互闡發，都在說明非西方存有所處的後殖民全球情境，亦即哈若圖寧所說的「被迫以比較的方式過生活」。而也就如哈若圖寧一直以來援用馬克思思想流變為例呼籲的，戰後蔚為主流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出來的文化理論縱然精深奧妙，但大多忽略了在它思維底部根深柢固的「西方vs.其他世界」對立，再加上西方馬克思主義高舉

98 見王德威《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論沈從文（介入）與胡蘭成（表演）的兩章。

(體系性的)「哲學」輕忽(存有經驗的)「歷史」的傾向,也致使其人漠視西方之外不同生產模式內涵的異質時間性。在這個意義上,主導當代理論生產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未能超脫它屬於西歐的「地方性」;相對地,非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哈若圖寧以日本的戶坂潤(1900-1945)為例:「他們的動機並不是(將馬克思主義)在地化;反之,他們深信,他們是在參與一場全球性、無可分割的活動,齊心面對當代的關鍵時機。」<sup>99</sup>換言之,其他世界的現代知識人他/她(被迫以比較的方式過生活)的養成與志向,從一開始原就是「世界」的;而其之混雜的世界觀可能也是行為者在民族國家、地緣政治等現代規範性體制中還能展現能動性的根源。

回到文學的脈絡,哈若圖寧所說的混雜就如體現多重時間性的夏目漱石——而與漱石類似,都兼善古典和現代的中國的魯迅、台灣的賴和理論上也可作如是觀——柄谷行人認為漱石的敘述作品大部分都雜揉了現代小說與日本古典的比如俳諧體,而深具批判性。<sup>100</sup>像是《心》(『こころ』),這本小說透過人物各自的第一人稱告白,坦露處在已經遺失前現代「同性情誼」(homosociality)得以接軌「同性性慾」(homosexuality)連續體(continuum)的現代日本,還夾帶著前朝記憶、慾望同性愛而不可得的男子其之被壓抑的內在黑暗面。<sup>101</sup>這套強迫異性戀(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機制致使小說人物之於現代社會抱持一份局外人的疏離感,甚至選擇自殺而歸於永恆的沈默,<sup>102</sup>從而曝現個體存有與外在世界交接的那個臨界點。

同樣地,本文一開始所例舉的《孽子》與《蒙馬特遺書》也都和《心》一般,一方面帶有在地前現代世界觀的遺留——在白先勇、邱妙津這裡,即其人其作中延續著的抒情傳統——另一方面也呈現同性情誼和慾望之間的連鎖;而這個事實也呼應了陳翠蓮提示的,橫跨不同空間、符號秩序的存有其之前世與

99 哈若圖寧著,陳春燕譯,〈將馬克思「去地方化」:省思一個文化主流〉,《歷史的記憶與日常:資本主義與東亞批判研究——哈若圖寧選集》,頁334。

100 柄谷行人,〈ジャンルの消滅〉,《定本 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頁241-259。中譯本,〈文類的消滅〉,《日本近代文學起源》,頁251-248。

101 J. Keith Vincent. *Two-Timing Modernity: Homosocial Narrative in Modern Japanese Fi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2), "Introduction."

102 同註101, Chap.4.

今生的若斷實續。換言之，本文所要強調的是，「被迫以比較的方式過生活」的非西方文學人白先勇與邱妙津，他／她們的同志書寫所呈現的高度混雜不必只是被認同與地緣政治所界範的單一「台灣人」身分證給標記，它其實更是台灣人處於其中的「不同時代的同時出現」之複數時間感「如其所是」的彰顯。透過這樣的彰顯，台灣人存有得以踰越民族國家、以至於任何的身分標籤，展演以及展開其之異質性，從而不斷更新「台灣」、甚至「人」所指的邊界。以前述的「同性情誼」與「同性性慾」話題而言，《蒙馬特遺書》的「我」和大學時期的友人小詠、巴黎結識的Laurence的關係其實都遊走在同性情誼和同性性慾之間：「小詠，過去我一直在虛構你，連你在東京也不再相信我對你的記憶了……然而，小詠，如果我不虛構，你敢看嗎？你敢面對我之於你最狂野的愛欲嗎？」（頁77）「她（Laurence）輕手輕腳地褪去全身的衣服，在我還來不及發現她要做什麼之前，她已潛進塞納河，一瞬間以她的裸體面對著我，我下體濕潤一片……陰部緊緊地抽搐……」（《蒙馬特遺書》，頁142）。而在《孽子》中，同性情誼多半在被佈置在「父—子」、「兄—弟」的儒家人倫構圖中——前者比如楊教頭與阿雄仔，林茂雄和小玉；後者則形諸龍子和阿青，阿青與趙英、與羅平——但一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倫理規範，白先勇將之酷兒化，使它逾越到同性性慾的領域。

事實上，一如前現代日本同性情誼與同性慾望的交錯淵遠流長，抒情傳統對同性情誼—性慾連續體的關注也有自成一格的表意程式。<sup>103</sup>不過前現代同性情誼的通往同性性慾終究屬於過渡性質，同性戀做為一種性傾向的身分標記、以至於存在的方式毋寧是現代的發明。換言之，這裡確實存在某種認識論的斷裂。而如果說《心》中「先生」之選擇引退、自死暗示著同性戀身分的敗北、消音，「現代／性」晉升為優位意符——對處於現代初期的漱石及其同時代文人而言，縱使能夠同情理解、甚至緬懷眷戀，同性情慾到底被歸入使國族陷於遲後境地的前現代鄙俗陋習——<sup>104</sup>相較之下，時序到了白先勇和邱妙津這裡，其之小說人物、以至於作者本人，儘管前景可能依舊黯淡、結局或許仍

103 可參康正果，《重審風月鑑：性與中國古典文學》（台北：釀出版，2016.02）。

104 同註101。

有挫折，但他／她們都堂而皇之地以同性戀的身分去探索愛、慾望與藝術的話題，去解構異性戀／國族建制，去介入傳統的賡續與翻新。在這裡，一方面，台灣作家的白、邱愈發肯認了漱石在東亞現代初期時候揭露的，同性戀能否做為一種存在的形態的命題；而再者，白先勇與邱妙津雖然都深刻意識或者體現了傳統和現代之間的「斷裂」，而不得不接受一種四界流浪、碎片般的不得地存在處境，不過也如本文最開始所示，兩人都未曾捨棄與前現代傳統的連結，想方設法在既是異性戀、也是西方霸權的現代線性時間中，以某種「創造性轉化」的方式保留抒情傳統的同性情誼—性慾連續體，而展現混雜異質的複數時間感。這即為柯慶明指出的，台灣「現代（主義）文學」不同於五四「新文學」之處，就在於前者非常不滿足於後者宣稱的，當代與傳統決然斷裂。<sup>105</sup>

而這些交織著抒情傳統感知與現代情慾模式的孽子逆女之混雜存有，所顯示的正是一種處在「現代—傳統」交界、跨國乃至跨文化等多重邊界地帶的主體位置。紀大偉在《同志文學史》中提出「酷兒時間性」以及「台灣的發明」嘗試界定這一主體位置的所由與所去。<sup>106</sup> 紀指出大量仰賴「文學」來為「同志」這一被壓抑的身分進行去污名的抗爭幾乎是台灣獨有的特殊現象，它落實在此間特定的本土歷史與地緣政治之中，故而是「台灣」這一相對於西方、中國等主要他者的另類空間所發明的一套符號律則。在這個意義上，紀大偉依循的仍然是台灣文學本土論常見的、以他者對比出自我的認同政治方法取徑，而其中最重要的他者依然一方面是西方（“homosexuality” vs. 「同志」；「普遍」vs. 「特殊」）；另一方面則為本土的對立面，中國。這裡的台灣／同志遂還是得在多重霸權的間隙中力求現身的另類邊緣身分。<sup>107</sup> 因而雖然提出「酷兒的種種時間表」——這是紀大偉對“queer temporalities”的翻

105 柯慶明，〈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中國文學的美感》。

106 見紀大偉，〈緒論〉，《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頁21-101，特別是頁22-32、68-70。

107 在〈緒論〉中，紀大偉表示他所掌劃的台灣同志文學史最主要的參照系是「冷戰」，而據他所說，冷戰其實可等同於「美國主導台灣」；如此一來，叛逆主導文化的酷兒時間性於他來說，除了批判本土父權、國族建構之將同志排除在外，就是反抗美國時間——本書的第四章就題為〈誰有美國時間〉——在〈緒論〉最後，紀大偉更進一步解釋：「同志文學的東亞地緣政治，在（這部）文學史是被嚴重低估的。」（頁100）這也就是此處所說的，地緣政治是《同志文學史》編寫最主要的框架，反霸權則是最基本的方法考量。

譯——<sup>108</sup>來強調同性戀對主流（國族的、異性戀的）時間議程之違逆，但就如將“temporalities”譯為可條列、參照的「時間表」，紀有關時間性的談法仍座落在空間化的時間之上，這裡的酷兒時間基本上還是隸屬以「同一vs.差異」組織的反霸權的本土文化民族主義行動。若然，那麼《孽子》與《蒙馬特遺書》的抒情母題，特別是涉及「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部分，很可能就會被輕輕帶過。如果不至於嚴加批判的話。

事實上，這一主體位置的立足點一方面固然見證空間上全球化與本土話語跨界協商的結果，亦即以台灣島、以至於台澎金馬這些個地方為基礎（place-based），而使差異的經驗能夠被理解而可比較、被闡連而形成與民族主義規範的「台灣」同一（identification）之共同立場；不過與此同時，它更通往不道地的混雜作為存有之本然狀態的時間—世界觀圖像，而處在根於地方、遵循特殊空間的符號律則而生成的、為認同政治所界範的「台灣」之前與之外。換句話說，這裡涉及的不僅為一個後設的「台灣」空間、被建構的本土場域；這一不道地混雜本體對於存有感到的焦慮，其之趨於道地本真（authenticity）的意志——此即為行為者能動性的來源——所朝向的是（先於、外於認同政治的）「台灣」種種獨一的（singular）差異存有共同／在（being-in-common）的（先於、外於地緣政治佈局的）「世界」。

陳春燕曾藉由海德格的學說來設想台灣的存在處境。簡言之，經歷海德格所謂「被甩到世界」（thrownness）的此在（Da-sein; being-there），正是因為自覺於存有本身的不地道，反而才有達致地道本真的可能。<sup>109</sup>而海德格同時提示，此在它恆常為在世的（being-in-the-world），這裡的「世界」不完全是一個既定的空間（如全球、美國或台灣），它更是一個持續展開、變換的時間的過程，此在於這個時間化的世界裡遭遇萬事萬物（things），自發地賡續革新（renewing）、乃至如其所是地成為（becoming）——海德格為此鑄造了一個術語，「世界中」（worlding），以求突出世界所蘊含的時

108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頁68-70。

109 陳春燕，〈非關認同：從儂曦、舞鶴談「共時性」的倫理〉，《中外文學》35卷5期，頁125-131。

間維度。<sup>110</sup> 在這個意義上，此在的存有從其根本就是與他人（者）的「共同存在」（Mitda-sein），「與子共在」（being-with）先於成為自我（being-self），他者、外部性早已滲透在身分認同、主體性的形構之中。<sup>111</sup> 而晚近王德威也借用海德格「世界中」的概念，以期將中國文學史從長久以來的民族主義桎梏中釋放，彰顯其之對世界開放（open to the world）、在根與根之間往還迴盪的「勢的詩學」——當然，較諸只是老生常談地突顯全球化、跨國性，王德威更想強調「世界」所內涵的「世界中」這一過程賦予存有的革新、生成，以及總是處於對話中的動態力量。<sup>112</sup>

結合陳春燕與王德威環繞海德格此在與世界說法的解讀，「台灣」不妨也能夠被視為一個「世界中」的共同體比喻。透過這樣的觀照，「台灣」遂是個在「世界中」的時間過程裡，與子共在而不斷展開（unfolding）、生成的存在處境，或者說，世界觀；這個意義上，「台灣文學」就不侷限於代表本土的身分、執著於再現的政治，而更是「台灣」經驗的有情或抒情彰顯（manifestation），它的複述（iteration），或者說，重複（repetition）之痕跡。而經由複述與重複的產述性（performativity），本土論共同立場的民族主義立足點可以保有自我修正的反身思考，同時某種在西方現代大敘述之外，宣成新的存有世界觀的能動性，也在此浮現。本文認為，這正是哈若圖寧與王德威都強調的，在解釋世界的提案中，恢復極為重要的時空關係（spatiotemporal relationships），重建時間與空間互緣共構之一種屢現。

110 “worlding” 觀念的說明，及其對於台灣人存有的「世界觀」可能有的啟發，可見本章開頭處的說明。

111 See Stephen Mulhall, *Heidegger and Being and Time*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Chapter 2. 尤其是其中之於《存有與時間》第26-29節的解釋在在強調，對海德格而言，存有本質上是社會性的。另外，當代法國思想家儂曦（Jean-Luc Nancy）也指出海德格的此在存有，從其根本，就是同時與他人／者的「共同存在」（Mitda-sein）；易言之，「與子共在」（being-with）先於成為自我（being-self），他者、外部（在）性早已滲透在身分認同、主體性的形構之中。Jean-Luc Nancy, *Being Singular Plural*, trans. Robert D. Richardson and Anne E. O’Byrn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6-30. 在這裡的解讀參考了陳春燕對儂曦的闡釋與相關術語的翻譯，同註109，頁142-143。

112 David Der-wei Wang, “Introduction: Worlding Literary China,” in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p.13-14.

## 五、結論：抒情的時空關係<sup>113</sup>

經由上一節環繞運用時間與空間的方法論執行的比較台灣研究其之得失的分析，本文提出從「世界中」的流變來解讀不道地的「台灣」朝向道地本真的賡續、生成，以及「台灣文學」所體現在這一展開過程中混雜的複數的時間感。在這個定義下的所謂「台灣」雖然勢必也牽涉、但絕不拘泥在民族主義的身分政治它對於族裔有機的起承轉合、名字純正的堅壁清野之念茲在茲，同時也不將世界視為現實主義的地緣政治佈局而已。相對於此，在看待「與子共在」先於任何認同、地緣政治等空間規範的「台灣」存有時，它主張從其根本，台灣就是個混雜著許許多多他者和外部性的存有，如同《孽子》的阿青是個本省母親與外省父親的混血兒；新公園充斥著台島各種族裔，乃至有日本、美國淵源者也在這裡往來；此在與此在在此，一個先於、外於任何規範條目的「台灣」相互產生關連，形成「世界中」的動態的「勢的詩學」。易言之，「世界中」的「台灣」總已經是「世界」的。若此，那麼被全球文學建制肯認、以至於弱裔（者）的跨國主義（minor transnationalism）呼籲固然都很重要，<sup>114</sup> 卻也不必是非如此不可的訓示。除此之外，從這個角度反思本土場域內的權力關係構造，則如台美、台日之間的殖民經濟和政治從屬等過往因為地緣政治的現實考量而刻意被遮蔽的不對等，亦得以從外加以曝現。在最後，本文即嘗試從抒情傳統的理論本身來反思與重建台灣存有的時空關係。

平心而論，抒情傳統原就對時間與空間的話題格外敏感。從這個論述敷衍的語境來說，陳國球對陳世驥生平的考證精彩地呈現了抒情傳統論外緣的那個

113 審查人之一質疑本文在這裡將王德威、陳世驥、以至於鄭毓瑜等學者所言的，未必在同一個脈絡中的「抒情傳統」放在一起談的合法性。確實，王、陳、鄭，或者柯慶明在談抒情傳統時，其人的用心固然各有側重。不過在晚近所謂「現代抒情傳統」、或者「抒情之現代性」的討論中，研究者如陳國球、黃錦樹也已經證明，儘管討論的對象有「古典」或「現代」之不同，不過整體而言，「抒情傳統」作為一套論述，一方面其實共享同一套一九四九大分裂遺留的離散時間感，以及它所夾帶的「感時憂國」情緒；另一方面，就知識的體系來說，抒情傳統論述也奠定在一套其實有脈絡可循的學術系譜之上。而最重要地，在有志於闡發「現代抒情傳統」的學人看來，「古典」和「現代」容或有斷裂（分屬差異的空間的符號秩序），但在兩端間時間的綿延仍然連貫著。在這個意義上，本文的將王德威、柯慶明、陳世驥與鄭毓瑜等人的說法串連在一起，固然是對於「現代抒情傳統」提議的回應。對於「現代抒情傳統」、「抒情之現代性」所進行的論述分析可見王德威、陳國球，《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09）。

114 Françoise Lionnet and Shu-mei Shih, eds. *Minor Transnation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由一九四九中國大分裂所牽動的大規模華人離散（Chinese diaspora）背景，而這一事件既標誌著時間上歷史的斷裂，也指向空間的流離失所。<sup>115</sup>目前學界多採取空間化的時間來合理與處理一九四九及其後的斷裂，亦即將之套上差異而對立的「新vs.舊」、「革命vs.反共」、「馬克思派vs.自由派」等史觀。不過主張「現代抒情傳統」的學者和陳翠蓮類似，<sup>116</sup>更願意鉤沉潛伏在橫跨多個空間化時間框架的個體行為者，其人情感與知識等經驗的連續性；也就是說，接近柄谷行人看待漱石的眼光，現代抒情傳統論者也意欲去彰顯「不同時代的同時出現」。而具現在文學的議程上，即為藉由「抒情」（the lyrical）加以批判模擬論主宰的再現機制和認可技術。

至於抒情傳統論的內部，其之學術論述本身，對於時間與空間的話題亦著墨甚多。陳世驥令人印象深刻的晚年力作〈詩時間的創始〉（“The Genesis of Poetic Time”）一文提出一套大膽的論證，<sup>117</sup>陳認為，在中國的先秦時代，「時」這個詞彙所指涉的時間觀念已在儒家的「實用論」（pragmatism）與道家的「理型論」（idealism）之外，發展出海德格意義上的「被甩到世界」（Geworfenheit; thrownness），亦即主觀的、涉及個我存在意識的含義；然而弔詭的是，較諸海德格學說成立在西方特定的思想系譜中，其人說法在之前與之後的浪漫派和存在主義都有跡可循，陳世驥認為中國對於「被甩到世界」的存有焦慮幾乎是平地一聲雷般的突如其來——<sup>118</sup>西元前4世紀，抒情傳統的第一位作者，偉大的詩人屈原出乎意料地表出了「人在時間中」、追求道地本真的存有焦慮——陳世驥因而主張，中國人對存有的時間感之體悟，源來於詩，根植在抒情傳統。另一方面，特別像是鄭清茂翻譯的吉川幸次郎談古詩19

115 陳國球，〈「抒情傳統論」以前：陳世驥早期文學論初探〉，《淡江中文學報》18期（2008.06），頁225-251。

116 例如王德威，《現代抒情傳統四論》（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08）。

117 Shih-hsiang Chen, “The Genesis of Poetic Time: The Greatness of Chu Yuan, a New Critical Approach.”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10 No.1 (1973.06), pp.1-44.

118 楊儒賓近來從思想史與宗教儀式的角度，對屈原橫空出世的世界觀做出有力的補充，見〈屈原為什麼抒情〉，《台大中文學報》40期（2013.03），頁101-144。

首的〈推移的悲哀〉，<sup>119</sup>與廖蔚卿討論「望歸」與「懷古」此二中國文學的核心主題在漢末以迄六朝的演繹，<sup>120</sup>這兩篇在抒情傳統論中時常被引用的經典文章，基本上也都從詩人的主觀感受來看待存有、時間與世界的連帶，而和陳世驥的說法在論點、時代與文類各方面，都形成相得益彰的互文足意。

而晚近，在鄭毓瑜環繞古典文學中的「空間／意象」之系列研究中，<sup>121</sup>她首先批評過往談抒情自我其之存有意識時過於特出主觀性的唯我論傾向，而忽略空間的外部性也在滲透、甚至牽制詩人道地本真的追尋；<sup>122</sup>相對於前人，鄭毓瑜更在意空間的作用，不過她認為文學中的地點或地景，比如建康、江南或者山水，絕非單純的物理性空間，也不是隨朝代興亡而更迭的政治（空間化）的時間，它同時亦為綿延的經驗（地方感）乃至文明傳統聯手打造的文化意象。若然，那麼抒情傳統「當然不只是社會結構、文化場域的象徵符碼，更擴大來說，它是宇宙觀或世界觀的體現：抒情言志的自我，不但應該置放回社會、文化的脈絡中來詮釋，也同時應該讓個我重回自然的懷抱。」而鄭所謂自然意指「包圍著人身的種種物質所構成的」、「整個人類」的「關係環境」——<sup>123</sup>這裡明顯可見海德格所說的，在／「世界中」的存有（worlding; being-in-the-world）與萬事萬物遭遇、展開而生成這一理路的痕跡。

無論如何，鄭毓瑜很有說服力地提出了如何借鏡抒情傳統的世界觀來看待古典文學乘載的時間與空間之互緣共構。然而現在的問題是，當場景挪移至四九後的台灣，一個從來就僻處華夏邊緣，甚至因殖民統治半世紀以來與中國大陸走向對立的現代性乃至民族性追求，在四九後卻反諷地被勉強塑造為連結

119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推移的悲哀：古詩十九首的主題（上）（下）〉，《中外文學》6卷4-5期（1977.09-10），頁24-54、113-31。吉川幸次郎其人實證意義上可以說與抒情傳統論述無涉，不過吉川師事京都學派東洋學大家狩野直喜，而京都學派整體而言與海德格思想、乃至德國心智哲學的淵源本就深厚，可見Harry Harootunian, *Overcome by Modernity: History, Culture,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具體表現在論文中，即詩人在「不幸的時間」中開啟的主體意識。

120 廖蔚卿，〈論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兩大主題：從登樓賦與蕪城賦探討遠望當歸與登臨懷古〉，《漢魏六朝文學論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7.12），頁47-97。本文原於1983年發表在《幼獅學志》。

121 集結為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4.12）。

122 可見鄭毓瑜對吉川幸次郎說法的批判——〈〈詩大序〉的論釋界域：「抒情傳統」與類應世界觀〉，《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頁239-292。

123 同註121，頁21。

斷裂的歷史、崩潰的傳統之微細的一線香的孤島，這樣的一個碎片般的存有要如何彰顯古典文學中嚴絲合縫的時空關係？而抒情傳統物我合一、情景交融的「類應」(correlation)、「對仗」(parallelism)世界觀可能在此間的文學史賡續綿延嗎？<sup>124</sup>換言之，抒情傳統論它自己能達致內(古典文學論述)與外(台灣本土情境)的同情共感、乃至和諧的抒情時刻嗎？本文以為若要談這個問題，除了前述已經說明的，行為者經驗的綿延可穿透地緣政治的框架以外——而且在《孽子》與《蒙馬特遺書》中，這種延續性確實可見——更重要的是，抒情傳統論述必須看成是遭遇「台灣」這一「世界」而賡續更新、展開生成的存有，否則它很可能落入中國民族主義的有機論神話中。亦即本文是站在其之抒情的發聲(lyrical enunciation)毋寧就是一種「台灣」的華語語系關連(Sinophone articulation)的這個立足點，來看待這一綿延的經驗。<sup>125</sup>

帶著這樣的認識回到白先勇和邱妙津的文本，這裡文本分析的想從比較原則性、象徵的方式來看《孽子》、《蒙馬特遺書》這些個「在這個島上生長的野娃娃」其之與抒情傳統的遭遇，且更進一步觀察這個遭遇一方面如何賡續、更新抒情傳統，另一方面又生成怎樣混雜的「台灣」存有。在這一方面，柯慶明將「情景交融」等古典抒情／詩理論帶入台灣現代派小說之分析的開創性研究深具啟發性。柯指出，六〇年代在台灣崛起的「現代文學」與中國五四「新文學」之最大不同在於，「現代文學」不若「新文學」將傳統拒之於門外，不認為傳統和現代處於斷裂的對峙緊張，而主張兩者乃彼此增益的相得益彰。不過柯慶明雖然鉤沉低迴在現代派求新實驗底下的古典抒情精神，力陳比起「橫的移植」，「縱的繼承」可能給予六〇年代所謂「現代主義」文學更多養份資源；但與此同時，柯也強調「現代」及「台灣」作為時空情境的斷裂意義。<sup>126</sup>而同樣關注抒情傳統與現代派小說的黃錦樹也有相近的觀點，他尤其

124 Chi Xiao, *The Chinese Garden as Lyric Enclave: A Gener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Stone* (Ann Arbor, Michigan: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1).

125 “articulation” 兼具「發聲」與「連結」的意思，這個詞在英國文化研究的健將拉克勞(Ernesto Laclau)與霍爾(Stuart Hall)的使用中成為重要的理論術語，當代華語語系研究也對其著墨頗多，如史書美華語語系專著書名的副標即為“Sinophone Articulation across the pacific”，同時可見 *Visuality and Identity* 一書的“Introduction”。

126 柯慶明，〈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中國文學的美感》，頁389-460，一文核心的主旨，見如頁396-429。

看重抒情傳統如何在冷戰時代的台灣中文系建制中被「創造性地轉化」。<sup>127</sup>

換言之，柯慶明和黃錦樹的說法一方面都特出了抒情傳統所具有的生成的力量，而這份力量實有推動台灣文學自我更新、創新的潛力；另一方面，其人的論證再次說明了「縱」的連續性（歷史、經驗的綿延）與「橫」的斷裂性（新舊〔身分與地緣政治〕符號秩序的更迭）其實縱橫交錯，「抒情」與「本土」相互闡發，不宜刻意偏袒任何一方的方法學之重要。畢竟就如《蒙馬特遺書》那個在經驗賡續、可預期的必然性，與意義不再完整自足、充滿斷裂的偶然性，兩方面拉扯的敘述者「我」所示——

一位朋友在偶然間告訴我，人生是由一大堆偶然性組成的，如果我相信什麼必然性，那只是我的幻覺，如果我還相信自己的生命有什麼必然的價值與意義，那麼，我就太缺少現代性而傾向古典了。我仍相信著必然性，但我也經常被瓦解的必然性擊潰，擊潰得一次比一次更徹底，更片甲不存，不是嗎？小詠，我是個膽大包天的賭徒嗎？（頁154）

作為「台灣」存有的個別行為者畢竟只能在時間與空間、必然和偶然、連續及斷裂相互牽連的混雜世界中，「世界中」地朝向道地本真做持續而未竟的探索。

整體而言，本文是對於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論已經累積的豐富成果，進行的一個初步的批判性回顧。這個回顧的目的不在於全盤否定前行的成果，相對地，是期望藉由對其之方法論的盤點，能更準確地看見它的洞見與不見。就如上文已清楚呈現的，現行台灣文學本土論有過於側重空間思維之虞，而本文經由整合一些當代的批判思想，乃至跨國與跨領域的研究成果與台灣文學本土論參差對照，試圖帶出一條（或一些）時間（性）的線索。以及更重要地，本文也力求呈現，在討論中所提示的這些那些時間與空間認識論，其實處於相互闡發之對話關係。本文寫作最直接的關心固然是為了給予那些「希望透過這部

127 黃錦樹，〈抒情傳統與現代性：傳統之發明，或創造性的轉化〉，《論嘗試文》（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6.08），頁47-86。

古典文學傑作（按，《紅樓夢》）」，當代年輕學子仍能「對我們的傳統文化，有所感悟，受到啟發」，<sup>128</sup> 那些「太缺少現代性而傾向古典」的「白先勇」、「邱妙津」們，存在於台灣本土文學史上的合法性。但更進一步地，透過借「抒情」和「傳統」之題在方法學上的發揮，本文亦期待能實質地在社會寫實與代現之外，為台灣文學研究帶來一些不同的研究視角，讓抒情與本土相互闡發地在「世界中」展開的軌跡得以如其所是地顯現。



---

128 白先勇，〈大觀紅樓〉，《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6.07），頁6。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大貫惠美子著，堯嘉寧譯，周俊宇審定，《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09）。

王德威，《茅盾·老舍·沈從文：寫實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9.07）。

——，《現代抒情傳統四論》（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08）。

——，《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2015.07）。

——，《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7.10）。

王德威、陳國球，《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09）。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06）。

白先勇，《孽子》（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9.03）。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6.07）。

吳叡人，《受困的思想：台灣重返世界》（台北：衛城出版，2016.07）。

周蕾，《寫在家國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07）。

邱妙津，《蒙馬特遺書》（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公司，2006.10）。

哈若圖寧（Harry Harootunian）著，陳春燕、劉紀蕙編，《歷史的記憶與日常：資本主義與東亞批判研究——哈若圖寧選集》（新竹：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12）。

柄谷行人，《定本 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08.05）。

——著，吳佩珍譯，《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7.12）。

柯慶明，《中國文學的美感》（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5.12）。

——，《台灣現代文學的視野》（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6.12）。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01）。

桑梓蘭著，王晴鋒譯，《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11）。

高友工，《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08）。

- 康正果，《重審風月鑑：性與中國古典文學》（台北：釀出版，2016.02）。
- 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台灣小說生產》（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6.03）。
- 張誦聖，《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04）。
- 梅家玲，《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2.11）。
- 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8.10）。
- ，《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04）。
- ，《台灣新文學史》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11）。
- 陳建忠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05）。
-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台北：衛城出版，2017.02）。
-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91.03）。
- 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出版社，1997.10）。
-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9.04）。
- 黃錦樹，《論嘗試文》（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6.08）。
-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87.02）。
- ，《台灣文學的困境》（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07）。
- 廖蔚卿，《漢魏六朝文學論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7.12）。
-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4.12）。
-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05）。
- ，《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12）。
- Chi Xiao, *The Chinese Garden as Lyric Enclave: A Gener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Stone* (Ann Arbor, Michigan: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1).
- David Der-wei Wang and Carlos Rojas eds. *Writing Taiwan: A New Literary Hist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David Der-wei Wang, ed.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Françoise Lionnet and Shu-mei Shih, eds. *Minor Transnation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trans.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 , *Infancy and History: The Destruction of Experience*, trans. Liz Heron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7).
- Harry Harootyan, *Overcome by Modernity: History, Culture,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 Jean-Luc Nancy, *Being Singular Plural*, trans. Robert D. Richardson and Anne E. O' Byrn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Jing Tsu,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J. Keith Vincent, *Two-Timing Modernity: Homosocial Narrative in Modern Japanese Fi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2).
-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Joan Stambaugh (Albany: SUNY Press, 1996).
- , *Off the Beaten Track*, trans. and eds. Julian Young and Kenneth Hay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Pascale Casanova, *The World Republic of World Letters*, trans. M.B. DeBevoi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Pheng Cheah, *What is a World: O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Shu-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 Shu-mei Shih, Chien-hsin Tsai, and Brian Bernards, eds.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 Stephen Mulhall, *Heidegger and Being and Time*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Sung-sheng Yvonne Chang, *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Walter Benjamin, *The Writer of Modern Life: Essays on Charles Baudela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二、論文

史書美著，紀大偉譯，〈全球的文學，認可的機制〉，《清華學報》34卷1期（2004.06），頁1-29。

——著，楊露遙譯，張錦忠校正，〈關係的比較學〉，《中山人文學報》39期（2015.07），頁1-19。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推移的悲哀：古詩十九首的主題（上）〉，《中外文學》6卷4期（1977.09），頁24-54。

——著，鄭清茂譯，〈推移的悲哀：古詩十九首的主題（下）〉，《中外文學》6卷5期（1977.10），頁113-31。

陳春燕，〈非關認同：從儂曦、舞鶴談「共時性」的倫理〉，《中外文學》35卷5期（2006.10），頁123-162。

——，〈全球情境，荒人觀點〉，《中外文學》37卷1期（2008.03），頁117-152。

——，〈時間與他者：後殖民全球化的當下〉，《英美文學評論》13期（2008.12），頁119-155。

——，〈文學（中）的身分：讀邱妙津日記〉，《中外文學》40卷3期（2011.09），頁97-138。

——，〈意義遲後：文學的當代位置〉，《英美文學評論》28期（2016.06），頁101-129。

陳國球，〈「抒情傳統論」以前：陳世驥早期文學論初探〉，《淡江中文學報》18期（2008.06），頁225-251。

張誦聖，〈談談幾個研究「東亞現代主義文學」的新框架：以台灣為例〉，《台灣文學研究集刊》5期（2009.02），頁41-58。

——，〈郭松棻〈月印〉和二十世紀中葉的文學史斷裂〉，《文學評論》2016年第2期，頁169-176。

——，〈戰時台灣文壇：「世界文學體系」的一個案例研究〉，《台灣文學學報》31期（2017.12），頁1-32。

張誦聖著，金林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與全球現代性：以台灣新電影的三位作者導演為考察中心〉，《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8期，頁115-123。

黃美娥，〈從「福建」看近代台灣與東亞漢詩文的交涉互動意義：以《送米溪先生詩文》為分析場域〉，《台灣文學學報》28期（2015.12），頁1-38。

楊儒賓，〈屈原為什麼抒情〉，《台大中文學報》40期（2013.03），頁101-144。

鍾秩維，〈抒情的政治、理論與傳統：重探一個台灣文學的批判論述〉，《中外文學》48卷2期（2019.06），頁169-226。

——，〈設想台灣人的華語語系觀點：關於「中國」與「共同體」的提問〉，《台灣文學學報》34期（2019.06），頁133-164。

Shih-hsiang Chen, "The Genesis of Poetic Time: The Greatness of Chu Yuan, a New Critical Approach."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10 No.1 (1973.06), pp.1-44.

Shu-mei Shih,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 significance of Taiwan."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6, No.2 (2003), pp.143-153.

